

# 南宋書法中的北宋情結

莫家良  
香港中文大學  
藝術系

## 提 要

南宋一向被視為中國書法史的「衰落」時期，雖然不乏能手，傳世亦見佳作，但卻沒有開宗立派的大師。然而，南宋書法的「保守」風格實表現出獨特的文化底蘊，反映了當時書家對於故家文化傳統的重視。故本文嘗試探討南宋書法的文化意義，以便對其價值及歷史地位得出較為客觀與公允的評價。

本文的討論分四部份。首先以藏書及藏帖為例，論述靖康之難後，宋人如何在浩劫之後重建文化。其次以刻書與刻帖為焦點，探討宋人如何透過複製之法，將書籍與墨跡刊刻出版，以發揚文化遺產。再次討論南宋文人對於北宋傳統的嚮往與敬慕，並以南宋「尊蘇」的現象作出闡述。最後專論南宋書法以蘇軾、黃庭堅、米芾三家為宗的現象，以及此現象背後所隱藏的文化意涵。

**關鍵詞：**南宋書法、北宋情結、故家傳統、南宋刻帖

在中國書法史上，南宋（1127-1279）書壇既沒有開宗立派的大師，也不見有風格上的重大變革，這已是古今論者的共識。傳統觀念一向重視大師風格，並慣以「變」作為審視藝術史的準則，加上處於「尚意」的北宋（960-1127）與「復古」的元代（1271-1368）之間，南宋便難免顯得相形見绌，甚至被視作書法史上的一個「衰落」階段。然而，若撇開傳統評論的桎梏，南宋書法卻未嘗沒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尤其是南宋書家在偏安一隅的時局下，如何以行動珍惜前人文物，如何以筆墨寄寓故家傳統，便是饒有意義的課題。因此，本文試從南宋初期文化重建的背景，以圖書及書跡的收藏與刊刻為例，說明南宋朝野內外致力保存與發揚本朝文化的現象，從而討論南宋主流書風以北宋蘇軾（1037-1101）、黃庭堅（1045-1105）、米芾（1052-1107）三家為楷模的問題。書法既為「心畫」，南宋書法所蘊含的北宋情結及其文化傳統，或許便是其價值所在。

## 一、失落與重建

靖康元年（1126），金兵攻陷汴京，帝后宗室貴戚等成為階下之囚，宋室所藏典籍書畫金石古器，亦喪失殆盡。其後南宋輾轉定都臨安，金甌半缺，已有殘山剩水之悲，而文物匱乏，更令弱勢的王朝雪上加霜，蓋自古以來，文物乃是治權的象徵，亦標誌著文化正統的繼承與國勢的盛衰。故南宋初年，局勢之艱可想而知，而文化重建，由是成為高宗（1127-1162 在位）朝的當務之急。至於文人士子，在國土淪亡的政治現實下，亦無不承受著文化失落的傷痛。以往北宋私人所藏文物，隨著戰火而大量散亡，如王明清（1127-?）所記：「靖康倣擾、中秘所藏與士大夫家者，悉為烏有。」<sup>1</sup>於扼腕嘆息之餘，不少南宋人遂以收藏為己任，以求回復昔日文物之盛況。

南宋的文化重建，以藏書方面最能窺其梗概。早於紹興（1131-1162）初年，高宗已開始搜訪遺書，並多次成功徵集。<sup>2</sup>紹興十三年（1143）復建國家藏書機構秘書省，更全面搜訪天下遺書。<sup>3</sup>至紹興十六年（1146），又進行一次重大的徵集，

1 王明清輯，《揮塵後錄》，卷7，頁17上。

2 例如紹興二年（1132），得平江府賀鑄之子賀廩所藏書籍五千卷。見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崇儒四·求書藏書〉，頁11。

3 「詔曰：國家用武開基，右文致治……藏書之盛，視古為多，艱難以來，散失無在。朕雖處干戈之際，不忘典籍之求，雖下令于再三，十不得其四五。今幸臻于休息，宜益廣于搜尋。夫監司總一路之權，郡守寄千里之重，各諭所部，悉上送官。苟多獻于遺編，當優加于褒賞。」載

並定下賞格，鼓勵臣民獻書。<sup>4</sup> 透過勸獻、收購、授官、獎賞等方法，高宗搜訪圖書頗收成效，宮中藏書於短期內得以恢復。其後南宋各朝續有增加。據孝宗（1163-1189 在位）淳熙五年（1178）就秘書省圖書編目整理而成的《中興館閣書目》所載，當時藏書有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而寧宗（1195-1224 在位）嘉定十三年（1220）所編的《中興館閣續書目》，則知新得圖書有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sup>5</sup> 嘉定十三年以後至南宋滅亡，秘書省所藏圖書必有新增，其他如宮廷、內廷諸閣、御書院、損齋、國子監、德壽宮等，亦有藏書，故南宋朝廷整體藏書數量，相當可觀。<sup>6</sup>

南宋的私人藏書，亦在百般艱難中重建起來。有關北宋末年兵燹為藏書帶來的破壞，周密（1232-1298）曾有以下記述：

宋室承平時，如南都戚氏、歷陽沈氏、廬山李氏、九江陳氏、番陽吳氏、王文康、李文正、宋宣獻、晁以道、劉莊與，皆號藏書之富。邯鄲李淑五十七類二萬三千一百八十餘卷，田鎬三萬卷，昭德晁氏二萬四千五百卷，南郡王仲至四萬三千餘卷，而類書浩博，若《太平御覽》之類，復不與焉。次如曾南豐及李氏山房，亦皆一二萬卷，然其後靡不厄於兵火者。<sup>7</sup>

可見十數藏書家盡失所藏，圖書之厄，令人頓足悲嘆。當時毀於戰火的圖書，並不止周密所記諸家，其他如趙明誠（1081-1129）、李清照（1084- 約 1155）夫婦收藏的散亡情況，記載更詳。趙氏夫婦的收藏，不僅有大量圖書典籍，更有書畫金石器物。據李清照記述，為逃避戰火，「建炎丁未春三月，彝太夫人喪南來，既長物不能盡載，迺先去書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畫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無款識者，後又去書之監本者、畫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屢減去，尙載書十五車。至東海，連艫

陳騭，《南宋館閣錄》，卷3，頁1下-2上，「儲藏·紹興十三年七月九日詔求遺書」條。「南渡以來，御府舊藏皆失，宜下諸路搜訪。其獻書者，或寵以官，或酬以帛。蓋教化之本，莫先於此也。」載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149，頁12下-13上。

4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崇儒四·求書藏書〉，頁14；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155，紹興十六年七月壬辰紀事，頁19上。

5 「迨夫靖康之難，而宣和館閣之儲，蕩然靡遺。高宗移蹕臨安，乃建秘書省於國史院之右，搜訪遺闕，屢優獻書之賞，於是四方之藏，稍稍復出，而館閣編輯，日益以富矣。當時類次書目，得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至寧宗時續書目，又得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視《崇文總目》，又有加焉。」脫脫等，《宋史》，卷202，〈藝文志一〉，頁3下-4上。另可參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174，〈經籍考一〉。

6 有關南宋官府藏書，可參考顧志興，《浙江藏書史》，上冊，頁87-94；傅璇琮、謝灼華編，《中國藏書通史》，上冊，頁297-348。

7 周密，《齊東野語》，卷12，頁8下-9上，「書籍之厄」條。

渡淮，又渡江，至建康。」<sup>8</sup> 惟留於青州之書冊雜物共十餘屋，期明年春再舟載搬運，惜於金人陷青州時化為煨燼。至趙明誠卒後，仍餘「書二萬卷，金石刻二千卷，器皿茵褥，可待百客」，之後李清照輾轉南下，經洪州、剡縣、會稽數劫，散亡者更不可勝數，最後僅「所有一二殘零不成部帙書冊，三數種平平書帖」巋然獨存。<sup>9</sup> 靖康之難，實是圖書收藏的一大浩劫。

雖然家藏圖書經過災劫，損失慘重，但不少藏書家卻於宋室南渡後，力圖重建收藏。例如葉夢得（1077-1148）家藏圖書達三萬餘卷，但兵火之後，散亡幾近半數，對於所失圖書，常覺悲痛惋惜。<sup>10</sup> 惟葉氏未感氣餒，繼續大力收藏，以圖恢復，終至平生藏書逾十萬卷，並建書樓儲藏。<sup>11</sup> 又如晁公武（約 1105-1180）之父晁說之（1059-1129）是北宋藏書家，「然自中原無事時已有火厄，及兵戈之後，尺素不存也」。<sup>12</sup> 但晁公武對藏書之業未有放棄，後得井度贈書五十篋，加上其家舊藏，合得圖書超過二萬卷。<sup>13</sup> 在南宋風雨飄搖的時代，葉、晁二家重建家藏圖書，在嗜書及克紹箕裘的因素背後，更有著保存文物、珍惜傳統的意識。南宋詩人陸游（1125-1210）的父親陸宰（1088-1148）是兩宋之際的著名藏書家，曾築「雙清堂」儲其所藏，並於紹興十三年（1143）響應高宗之詔，向朝廷獻書超過一萬三千卷。<sup>14</sup> 陸氏於紹興八年（1138）的一段文字，頗堪留意：

本朝藏書之家，獨稱李邕鄆公、宋常山公，所蓄皆不減三萬卷，而宋書校讐尤為精詳。不幸兩遭回祿之禍，而方策掃地矣。李氏書，屬靖康之變，金人犯闕，散亡皆盡。收書之富，獨稱江浙，繼而敵騎南驚，州縣悉遭焚劫，異時藏書之家，百不存一。縱有在者，又皆零落不全。予舊收此書，

8 趙明誠，〈後序〉，《金石錄》，頁 3。

9 同註 8，頁 4。

10 葉夢得自述云：「余家舊藏書三萬餘卷，喪亂以來，所亡幾半。山居狹隘，餘地置書囊無幾，雨漏鼠齧，日復蠹敗。今歲出曝之，閱兩旬纔畢，其間往往多余手自抄，覽之如隔世。」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上，頁 3 下。

11 「南渡以來，惟葉少蘊少年貴盛，平生好收書，逾十萬卷，寘之雪川弁山山居，建書樓以貯之，極為華煥。」見王明清輯，《揮塵後錄》，卷 7，頁 17 下。亦有研究謂此十萬卷有誇大之嫌，實際數目應為四五萬卷左右。見方建新，〈宋代大藏書家葉夢得的藏書活動及其對圖書事業的貢獻〉，載黃建國、高躍新主編，《中國古代藏書樓研究》，頁 292-301。

12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原序〉，《郡齋讀書志》，頁 1-2。

13 「（井度）書凡五十篋，合吾家舊藏，除其複重，得二萬四千五百卷有奇。今三榮僻左少事，日夕躬以朱黃讎校舛誤，每終篇輒撮其大指論之，豈敢効二三子之博聞，所期者不墜家聲而已。」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原序〉，《郡齋讀書志》，頁 1-2。

14 「紹興十三年，始建秘書省於臨安天井巷之東，仍詔求遺書於天下，首命紹興府錄朝請大夫直秘閣陸宰家所藏書來上，凡萬三千卷有奇。」施宿等，《會稽志》，卷 16，頁 29 下，「求遺書」。

得自京師，中遭兵火之餘，一日於故篋中偶尋得之，而蟲齧鼠傷，殆無全幅。綴緝累日，僅能成帙。乃命工裁去四周所損者，別以紙裝背之，遂成全書。嗚呼！予老癩目昏，雖不復讀，然嗜讀之心，固未衰也。後世子孫知此書得存之如此，則其餘諸書幸而存者，為予寶惜之。<sup>15</sup>

這種劫後圖存的心情，當可作為南宋初年士人銳意重建收藏的寫照，而其對子孫的期望，無疑充滿著南宋士人於離亂之際的文化情結。陸宰之後，其子陸游及孫陸遜均能繼承家風，使陸家成為南宋著名的藏書世家。<sup>16</sup> 從陸游為《東坡集》所書一跋所見，其惜書之心並不遜於其父：「此本藏之三十年矣。嘉泰甲子（1204）歲十二月，遺燼幾焚之。予緝成編，比舊本差狹小，乃可愛，遂目之曰焦尾本云。」<sup>17</sup> 陸宰若泉下有知，亦必欣慰。

南宋偏安之局形成後，藏書事業發展蓬勃。據載至孝宗及光宗（1190-1194 在位）朝，「仕官稍顯者，家必有書數千卷」，其盛況不減北宋，甚或過之。<sup>18</sup> 事實上，南宋不僅官家藏書復興，私家收藏亦媲美北宋，藏書文化，可謂盛極一時。<sup>19</sup> 就收藏文化而言，圖書無疑是至為重要之物，而與書法相關的金石碑帖、前人墨蹟等，亦為文物的重要部分，於南宋文化重建至為重要。在內府方面，高宗時已致力於搜集書畫。按周密所述：「思陵妙悟八法，留神古雅，當干戈俶擾之際，訪求法書名畫，不遺餘力。清閑之燕，展玩摹搨不少怠，蓋嗜好之篤，不憚勞費，故四方爭以奉上無虛日，後又於榷場購北方遺失之物，故紹興內府所藏，不減宣政。」<sup>20</sup> 可知紹興時，南宋內府已有頗為可觀的法書收藏。但據《南宋館閣錄》及其《續錄》所載，則知淳熙（1174-1189）至嘉定（1208-1224）年間，內府法書收藏由一百二十六軸又一冊增加至二百一十五軸又一冊。<sup>21</sup> 雖然二書並未記載所有內府所藏書跡，例如秘書省以外的收藏，但相信南宋內府法書收藏的數量，實難及宣和（1119-1125）時期，周密所謂「不減宣政」，應是溢美之言而已。欲在短期內重建可媲美宣和的龐大法書收藏，對於南宋宮廷來說，確是重大挑戰。傳世所見的一幀尺牘（圖 1），是吳說（?-1169 以後）書予友人訴說奉旨訪求晉唐墨跡之事，信中謂所

15 陸游，〈跋京本家語〉，《渭南文集》，卷 28，頁 4 下 -5 上。

16 有關陸宰三代藏書論述，參見顧志興，《浙江藏書家藏書樓》，頁 31-38。

17 陸游，〈跋東坡集〉，《渭南文集》，卷 30，頁 4 下 -5 上。

18 王明清輯，《揮塵前錄》，卷 1，頁 15 下 -16 上。有關宋代藏書，參見潘美月，《宋代藏書家考》；潘銘棗，〈宋代私家藏書考〉，《華國》，第 6 期（1971），頁 201-262。

19 有關南宋藏書家人數，參見傅璇琮、謝灼華編，《中國藏書通史》，上冊，頁 353-356。

20 周密，〈紹興御府書畫式〉，《齊東野語》，卷 6，頁 1 上。

21 有關南宋內府法書收藏的論述，參見方愛龍，《南宋書法史》，頁 259-271。

獲「止有唐人臨蘭亭一本」，正可反映當時搜訪書跡之不易。<sup>22</sup>

在宮廷以外，法書墨跡亦是不少南宋士人所致力保存之物，蓋於兵火戰亂間，不少前人手跡亦如圖書般難逃一劫。前述趙明誠夫婦的收藏，便包括大量書畫金石，惜皆隨兵燹而散亡。陳傅良（1137-1203）嘗跋所見歐陽修（1007-1072）與王素（1027年進士）帖云：「魯直帖往往有之，如歐王二公帖，蓋不多見。靖康之變，士大夫故家文物淪喪，可勝道哉。間見一二，令人隕涕。」<sup>23</sup>悲愴唏噓之情，溢於言表。前賢遺墨為北宋故家文物的重要部份，故為南宋士人所珍惜。即就南宋藏書家來說，不少在圖書之外，兼藏金石書法。例如葉夢得嘗家藏碑帖一千多帙，並作出整理編次，輯成《金石類考》五十卷。<sup>24</sup>石邦哲「博古堂」藏書二萬卷，所收碑帖法書甚多。<sup>25</sup>尤袤（1127-1194）收藏則以多抄本、多善本、多史書、多法書為特色，有云其「藏書至多，法書尤富」。<sup>26</sup>陳思為宋理宗（1225-1264在位）時人，不僅藏書豐富，更以刻書與售書為業，並頗有古碑收藏，所刻《寶刻叢編》便是搜錄古碑而編成的著錄。至若陸游，則秉承家風，終生寄情於藏書，並名其藏書之所為「書巢」，晚年則名書齋為「老學庵」，所藏圖書不下萬卷。<sup>27</sup>從其文集所見，陸游亦藏有不少名家手跡，每於觀賞後為之題跋。岳珂（1183-1241後）的書法收藏亦堪注意。岳珂為岳飛（1103-1142）孫，父岳霖（1130-1192）好收藏，岳珂繼承父志，致力搜集祖父遺文，同時繼續增藏，又為家藏書跡題寫跋贊，編成《寶真齋法書贊》。目前所見的《寶真齋法書贊》並非完本，故所載書跡只是岳珂的部分收藏，但仍有歷代書跡七百七十九帖（種），凡二百零九家，數量相當龐大。<sup>28</sup>其他著名圖書兼書法的收藏，有賈似道（1213-1275）的「悅生堂」，所藏書畫碑帖超過千卷，不少為宣和紹興秘府故物，記載於《悅生古蹟記》及《悅生所藏書畫別錄》，惜前書已佚；<sup>29</sup>周密的「書種」及「志雅」二堂，收藏圖書四萬二千餘卷，金

22 有關該幀尺牘的論述，見何傳馨主編，《文藝紹興——南宋藝術與文化·書畫卷》，頁351-352。

23 陳傅良，〈跋歐王帖後〉，載陳傅良撰、曹叔遠編，《止齋集》，卷41，頁6下。

24 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上，頁21上。

25 潘美月，《宋代藏書家考》，頁170-171；顧志興，《浙江藏書家藏書樓》，頁39。

26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8，頁11上，「遂初堂書目一卷」條。

27 陸游，〈雨後極涼料簡篋中舊書有感〉云：「笠澤老翁病蘇醒，欣然起理西齋書。十年燈前手自校，行間顛倒黃與朱。區區樸學老自信，要與萬卷歸林廬。」載陸游撰、陸子虛編，《劍南詩叢》，卷12，頁26上。有關陸游藏書的論述，參見潘美月，《宋代藏書家考》，頁184-191；顧志興，《浙江藏書家藏書樓》，頁32-37。

28 此統計參見方愛龍，《南宋書法史》，頁271-275。

29 周密，《癸辛雜識》，後集，頁50；佚名，《悅生所藏書畫別錄》，載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

石之刻一千五百餘種，並編有《書種堂書目》及《志雅堂書目》，分別記載家藏書籍及金石，惜皆不存；<sup>30</sup> 趙與勳亦為南宋末藏書家，其收藏書畫見於周密的《雲煙過眼錄》。

以上藏書家之例只是南宋時期書法收藏的冰山一角，若翻閱文獻，不難發現南宋士人收藏前人遺墨實是甚為普遍之事，其中又以北宋墨跡為最多。劉克莊（1187-1269）跋蔡襄（1012-1067）帖云：「蔡公歿將二百年，宅相子孫寶其遺墨，雖寸紙隻字，亦補綴成帙，如襲珠璧」，如此珍如拱璧，將蔡襄遺墨「補綴成帙」，與前文所述陸游緝補的「焦尾本」《東坡集》，在保存故家文物上，無疑有著異曲同工的意義。<sup>31</sup>

## 二、保存與傳播

重建收藏可說是南宋文化復興的基礎，而如何將收藏悉心保存與傳播，亦是關鍵。就圖書與法書而言，將之複製無疑是繼承與發揚文化遺產的上佳手段。大體來說，宋代雕版印技術發達，加上刻書與刻帖技術相近，故南宋刊刻圖書蔚然成風，書跡的摹刻亦不遑多讓，形成了當時極為濃厚的刊刻文化。雖刻書與刻帖在技術上存在差異，蓋一為凸起陽文，一為凹下陰紋；一為反書倒讀，一為正書順讀；拓印後一為白底黑字，一為黑底白字，但若從刻字與拓印複製的技術來說，卻並非兩個截然不同的系統。<sup>32</sup> 可以說，就南宋的文化氛圍來說，刻書與刻帖實可視為可以互相表裡的複製活動，對於圖書與法書，既可保存，亦有利於流傳。

北宋時宮廷已有經常性的圖書編纂與刻印活動，至南宋時亦承舊習，於紹興九年（1139）重建國子監，並於監中刊刻大量經典史籍，以保充所缺藏書，正如文獻所載：「監本書籍者，紹興末年所刊也。國家艱難以來，固未暇及。九年九月，張

書·2》，頁 727。

30 周密曾自述：「吾家三世積累，先君子尤酷嗜，至鬻負郭之田以供筆札之用。冥搜極討，不憚勞費，凡有書四萬二千餘卷，及三代以來金石之刻一千五百餘種，度置『書種』、『志雅』二堂，日事校讎，居然蠶金之富。」周密，《齊東野語》，卷 12，頁 9 下。有關周密藏書的論述，參見潘美月，《宋代藏書家考》，頁 231-232；顧志興，《浙江藏書家藏書樓》，頁 46-48。

31 劉克莊，《蔡端明帖》，《後村集》，卷 32，頁 2 上。有關南宋私家書法收藏的綜述，參見方愛龍，《南宋書法史》，頁 271-278。

32 刻帖與刻書的關係，亦可從刻工了解，如傳世《淳化閣帖》拓本刻有刻工姓名，包括張通、郭奇、王成等，這些刻工皆參與書籍刊刻。有關討論見顧音海，《國子監本《閣帖》的刻工問題》，載陳燮君、汪慶正、單國霖編，《《淳化閣帖》與「二王」書法藝術》，頁 59-63。

彥實待制，爲尚書郎，請下詔諸道州學，取舊監本書籍，鏤板頒賜，從之，然所取諸多殘缺，故舊監刊，六經無禮記，三史無漢書。二十一年五月，輔臣復以爲言。上謂秦益公曰：『監中所闕之書，亦令次第鏤板，雖有重費，亦所不惜也。』由是籍經復全。」<sup>33</sup> 至於宋代官方刻帖，可溯源至北宋太宗（976-997 在位）時的《淳化閣帖》，南宋高宗於紹興十一年（1141）刻《紹興國子監帖》，乃是《淳化閣帖》的翻刻；同年，又以內府所藏米芾遺墨，刻成《紹興米帖》（圖 2）。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有《淳熙修內司帖》，又名《淳熙秘閣前帖》，亦是《淳化閣帖》的翻刻；又下令彙刻《九朝御書法帖》及《淳熙秘閣續帖》，分別摹勒北宋太祖（960-976 在位）至欽宗（1125-1127 在位）九朝皇帝御書，以及南渡後續得的晉唐遺墨。其他官方刻帖還包括《宋高宗御臨法帖》與《至道御書法帖》，前者刊刻宋高宗所臨歷代帝王名臣法帖，後者專收北宋太宗宸翰；此外亦有其他兩宋帝王御書刻石。<sup>34</sup> 南宋官方刊刻法帖，無論是翻刻《淳化閣帖》者，或是摹刻帝王御書，在文化保存與傳播的意義外，當然更有昭示文化道統、彰顯宋室皇權的象徵作用。

在私家收藏方面，不少藏書家均喜於將所藏圖書刻印出版，甚至出售。著名例子有寧宗時曾考中解元的陳起，以「芸居樓」收藏圖書，並開設書籍舖，所售書籍主要爲自刻，字體秀勁圓活，甚得時譽，其刊刻圖書以詩文集爲主，又有畫論與筆記集。<sup>35</sup> 陳思則以「續芸居」爲其藏書樓，「儷書於都市」，刻印之書除《寶刻叢編》外，亦包括《書苑精華》、《書小史》等與書法相關的著作。<sup>36</sup> 與此同時，部分南宋藏書家不僅刊刻圖書，更以其所藏書跡摹勒上石，將前人法書拓印成帖。藏書刻書、藏帖刻帖兼重的南宋藏書家，陸游可謂典型。陸游一生宦游所至，除致力搜藏圖書外，每有刻書印行，例如曾於四川攝犍刻《岑嘉州詩》，桐廬刻《釣臺江公奏議》，江西倉司刻《陸氏續集驗方》，浙江嚴州刻《南史》、《世說》、《大字劉賓客集》、《劍南詩稿》及《江諫議奏議》等，另亦刻其高祖太傅公《修心鑒》。至於書法，陸游嘗於乾道年間，「取家藏前輩筆札，刻石嘉州荔枝樓下，名《宋法帖》」。<sup>37</sup>

33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 4，頁 13 下 -14 上，「監本書籍」條。

34 程文榮，《南村帖考》，頁 193-194。趙汝愚等劄子云：「照會本省有累朝御書並歷代名賢墨蹟，竊慮歲久或致蠹弊，乞降指揮依秘閣舊來體例，摹勒上石。」載佚名，《南宋館閣錄續錄》，卷 3，頁 1 上，「儲藏」條。南宋的御書刻石，見同書。

35 顧志興，《浙江藏書家藏書樓》，頁 48-50。

36 「陳思儷書於都市，士之好古博雅蒐遺獵忘以足其所藏，與夫故家之淪墜不振，出其所藏以求售者，往往交於其肆，且售且儷，久而所閱滋多，望之則能別其真贗。」陳思，《寶刻叢編》，頁 3，陳振孫序。另參見顧志興，《浙江藏書家藏書樓》，頁 52-53。

37 佚名，《愛日齋叢鈔》，卷 1，頁 16 上。

此帖亦稱爲《荔枝樓帖》，惜今不傳，然陸游將其家藏宋人書跡，以摹刻之法複製，以方便保存與流傳的本意，不難理解。陸游擅書，對於家藏前人墨跡，固然是珍如拱璧，而對於他人所收翰墨，亦同樣愛惜。例如其好友施宿（1164-1222）藏有一幀蘇軾書札，陸游觀賞之餘，書跋如下：「成都西樓下有汪聖錫所刻東坡帖三十卷，其間與呂給事陶一帖，大略與此帖同……予謂武子當求善工堅石刻之，與西樓之帖並傳天下，不當獨私囊褚，使見者有恨也。」<sup>38</sup> 施宿有否接納陸游之議，將該幀書札刻石捶拓，已不得而知。陸游跋中所提及的東坡帖三十卷，即是著名的《西樓蘇帖》（圖3），爲汪應辰（1118-1176）所刻。陸游異常喜愛蘇軾書法，曾對另一十卷本的《西樓蘇帖》，「擇其尤奇逸者爲一編，號《東坡書髓》，三十年間未嘗釋手。去歲在都下，脫敗甚，乃再裝緝之。」<sup>39</sup> 從汪應辰搜集蘇軾遺墨，到將書跡摹刻上石，至墨拓成帖，整個過程所耗的時間與精神，並不簡單，但對於南宋文人來說，惟有如此才可實現文化保存與傳播的願望；而《東坡書髓》的編成至脫敗後再裝緝，除可見陸游傾慕蘇軾書法外，亦足證其保存文物的苦心。

其他藏書家如岳珂與廖瑩中（?-1275），亦於藏書外兼事刻書刻帖。岳珂所著《金陀粹編》、《金陀粹編續編》、《愧郟錄》、《程史》等書，均於嘉興刊刻；刻帖則有《英光堂帖》（圖4），乃是據其家藏米芾書跡，於紹定二年至六年間（1229-1233）在鎮江鐫刻而成。<sup>40</sup> 《英光堂帖》只摹刻了岳珂的部份家藏書帖，其《寶真齋法書贊》所載的大量其他歷代書跡，並沒有摹刻上石，殊爲可惜。廖瑩中《世綵堂》所刻之書如《九經》、《韓昌黎集》、《柳河東集》、《春秋經傳集解》、《論語》、《孟子》等，均爲世所稱；其刻帖則有據賈似道所藏而翻刻的《淳化閣帖》與《絳帖》，又鐫刻近世名人書跡。<sup>41</sup>

以上數例，只是嘗試結合刻書與刻帖，說明法書的保存與傳播與當時濃厚的刊刻風氣相關。若只就刻帖而論，法書的收藏當然不限於藏書家，而刻帖亦並非藏書

38 陸游，〈跋東坡帖〉，《渭南文集》，卷29，頁3。

39 陸游，〈跋東坡書髓〉，《渭南文集》，卷29，頁11下-12上。

40 《英光堂帖》有殘本傳世，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及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有關《英光堂帖》的研究，參見林業強，〈宋拓《英光堂帖》考——兼論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第三卷〉，載中國法帖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法帖全集》，冊10，頁17-35。

41 「（廖瑩中）又刻陳簡齋去非、姜堯章、任希夷、盧柳南四家遺墨十三卷皆精妙」；「（廖瑩中）又刻小字帖十卷，則皆近世，如盧方春所作〈秋壑記〉、王茂悅所作〈家廟記〉、〈九歌〉之類。又以所藏陳簡齋、姜白石、任斯庵、盧柳南四家書爲小帖，所謂《世綵堂小帖》者。世綵，廖氏堂名也。」分見周密，《志雅堂雜鈔》，載陶宗儀編，《說郛》，卷27下，頁19；〈賈廖碑帖〉，載周密，《癸辛雜識》，後集，頁31下-32上。

家或刻書家的專有活動。事實上，在刊刻文化興盛之下，南宋的刻帖發展蓬勃，所刻數量已超越前代。據統計，目前可考者有六十種以上，包括有歷代叢帖、斷代叢帖、個人叢帖、單刻帖等。<sup>42</sup> 刻帖文化興盛，原因固多，惟靖康之難所帶來的文化浩劫，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南宋文人珍惜前人遺墨的決心。書於縑楮的墨跡，本已不利耐久收藏，加上難以預測的天災人禍，更易損毀散亡。事實證明，從僥倖仍然傳世的南宋刻帖所見，絕大部分的原跡墨本，皆隨著歷史而煙消雲散，可見不少前人書跡，實有賴摹刻上石，才得以用墨拓的形式，流傳千古。

### 三、「渡江文物，追配中原」

南宋的文化重建不僅有助朝廷確立統治的合法地位，亦為愛國的宋人重拾失落的文化傳統。靖康之難為宋人所帶來的衝擊，不僅在於國土的淪喪，還有北宋文化傳統驟然消亡的危機。因此，在南渡初年，不少宋人推崇中原傳統、緬懷故家舊法，所謂「渡江文物，追配中原」，遂成為南宋文化的一大特色。<sup>43</sup> 這種文化心態，即使到了南宋中期，仍散見於詩文之中。例如陸游詩曰：「大駕初渡江，中原皆荒蕪。吾猶及故老，清夜陪坐隅。論文有脈絡，千古著不誣」、「我雖生亂離，猶及見前輩。衣冠方南奔，文獻往往在。幸供灑掃役，跡忝諸生內。話言猶在耳，造次敢不佩」，對於中原文獻典型與南渡諸賢，傾慕不已。<sup>44</sup> 又如趙蕃（1143-1229）詩句：「元祐蘭臺妙人物，我今寂寞媿諸孫」、「吾州自昔寡所傳，一自南渡居群賢」；韓澆（1159-1224）詩句：「元祐相家文物在，喚回洛社舊昇平」、「故家南渡衣冠少，前輩中原文獻長」，無不以元祐故家與南渡前輩為精神依皈。<sup>45</sup>

南宋人對於北宋文化傳統的眷戀、保護與繼承，可從當時的「尊蘇」現象一窺梗概。蘇軾為北宋文壇領袖，但因政治主張與新舊黨爭，常遭貶謫，即使死後仍被「追削故官」。<sup>46</sup> 徽宗（1100-1125 在位）崇寧元年（1102）九月，立「元祐黨籍

42 按目前統計，可考的南宋叢帖，包括官刻與私刻，有六十種以上。見方愛龍，《南宋書法史》，附表《南宋主要叢帖一覽表》，頁 293-300。

43 李處全，《曾程堂記》，載鄭虎臣編，《吳都文粹》，卷 9，頁 39 下。

44 陸游，〈書歎〉、〈謝徐居厚汪叔潛携酒見訪〉，分載陸游撰、陸子虛編，《劍南詩藁》，卷 7，頁 22 下 -23 上；卷 30，頁 17 上。

45 趙蕃，〈寄黃子耕〉、〈別韓尚書〉，分載趙蕃，《乾道稿·淳熙稿》，卷 15，頁 13；卷 5，頁 7 下；韓澆，〈題司馬寺丞約汪倅、趙倅携酒相過澗亭〉、〈二十五日次韻昌甫別後所璿·其二〉，分載《澗泉集》，卷 11，頁 15 下 -16 上；第 8 冊，卷 13，頁 6 上。

46 〈故朝奉郎蘇軾降授崇信軍節度行軍司馬制〉，載佚名，《宋大詔令集》，卷 210，政事 63，頁 796。

碑」，列蘇軾等凡三百零九人，其後更詔令士人不許傳習元祐學術，蘇軾著述，包括其文辭字畫、碑碣榜額等，遂被一律禁毀。南宋初，高宗推行復興政策，元祐諸臣得到昭雪，蘇軾亦恢復名譽，其後孝宗更親撰〈東坡全集序〉，對蘇軾高度評價，稱其為「一時廷臣，無出其右」。<sup>47</sup> 對於文人士子，蘇軾本是深受敬重的文壇模範，朝廷的平反與讚揚更將蘇軾的名望推上極致。由於元祐黨禁對蘇軾著述的流傳影響甚大，故南宋士人非常重視蘇軾著作的保存，並透過整理、刊刻、研究，使蘇軾之學得到發揚。蘇軾的著述在生前已有刊刻，即使受到政治禁毀，民間亦續有流傳，惟若論風氣之盛，則以南宋為高峰。陸游嘗記云：「建炎以來，尚蘇氏文章，學者翕然從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語曰：蘇文熟，喫羊肉；蘇文生，喫菜羹」，足見蘇軾詩文風行一時。<sup>48</sup> 南宋所編刻的蘇軾著作非常全面，包括詩文全集、詩集、詞集、文選集等，刊本甚多，有據北宋舊編重印，有重新編校補缺，亦有加以注釋刊刻，從中可見南宋人旁採博收、探索鉤沉的努力。<sup>49</sup> 此外，南宋所編蘇軾年譜不下十種，數量為歷代之冠，蘇軾在南宋文人心中地位之高，可以想見。宋孝宗所謂「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更可說是南宋追緬北宋文化的最佳寫照。<sup>50</sup>

除文學著作外，蘇軾的手書墨跡亦早在生前已為世人所重，即使元祐黨禁後，受珍愛的程度更有增無減。李綱（1083-1140）曾有記述，道出當時情況：「方紹聖元符間，擯斥元祐學術，以坡為魁惡之者，必欲置死地而後已。及崇觀以來，雖陽斥而陰予之。殘章遺墨，流落人間好事者，至龕屋壁徹板屏，力致而寶藏之，惟恐居後。故雖鯨海萬里，搜裒殆盡，此與跡削於生前而履傳於身後者，亦何以異。」<sup>51</sup> 至南宋初年經歷中原淪陷之劫後，蘇軾遺墨更顯珍貴。高宗時，詔求天下遺書，並及書畫，記載中有得蘇書臨本於報恩寺一事：「坡歸至常州報恩寺，僧堂新成，以板為壁，坡暇日題寫幾遍。後黨禍作，凡坡之遺墨，所在搜毀。寺僧以厚紙糊壁，塗之以漆，字賴以全。至紹興中，詔求蘇黃墨跡，時僧死久矣，一老頭陀知之，以告郡守。除去漆紙，字畫宛然，臨本以進，高宗大喜，老頭陀得祠曹牒為僧。」<sup>52</sup> 毋庸置疑，此故事只是冰山一角，世人於蘇軾書跡不單不忍毀棄，更千方百計加以保存。

47 宋孝宗，〈東坡全集序〉，載蘇軾，《東坡全集》，頁1上。

48 陸游，《老學庵筆記》，卷8，頁1上。

49 有關南宋時蘇軾著作的編刊情況，參見曾棗莊等，《蘇軾研究史》，頁79-155。

50 宋孝宗，〈宋贈蘇文忠公大師勅文〉，載蘇軾，《東坡全集》，頁1下。

51 李綱，〈跋東坡小草〉，《梁谿集》，卷163，頁8上。

52 羅大經，《鶴林玉露》，卷9，頁8下。

南宋時，世人皆以收藏蘇軾墨跡為榮。以岳家為例，岳飛景仰蘇軾書法之餘，並學蘇書，至其孫岳珂，秉承家世傳統，所收蘇書頗多，《寶真齋法書贊》所載蘇軾遺墨，有來自家藏，亦有從其他藏家所得，或以鬻買方式購藏，甚至得於鄺鬻，共二十九帖，數量僅次於所藏米芾與黃庭堅帖。<sup>53</sup> 岳珂非常重視蘇軾遺墨，若得罕見之帖，更感欣喜。<sup>54</sup> 例如於岳珂於無錫故家得蘇軾〈金丹帖〉後，以此帖為其所藏所見蘇帖之最佳者，喜而跋曰：「予平生藏先生帖，清逸真妙，惟此為最。目閱諸藏書家帖字半世矣，亦未有一紙可與此帖並者。瓣香之敬，情事固應爾耳。」<sup>55</sup> 後又買得蘇軾〈大字詩帖〉，因感蘇軾大字難求，其家所藏蘇書又多為詩簡，故倍感珍惜，並贊曰：「小字鵠引騫而翔，大字虎臥靖且莊。我藏遺帖雖盈箱，尙歎鉅刻無滌黃。誰憐神物開混茫，想見醉墨猶淋浪。此題要補束皙亡，更恐有詩書雪堂。」<sup>56</sup> 在岳珂其他的跋贊中，有稱處世之大節，有嘆人事之易變，有考詩帖寄寓之情，亦有論翰墨之精奇，無不從蘇軾翰墨文字間，追想前輩風範。事實上，就蘇軾遺墨而書的南宋題跋，到處可見，揭示出蘇軾書跡的收藏與賞鑑，乃是南宋追思故家文化的一種寄托方式。陳傅良的〈跋東坡與章子厚書〉，正是其中一例：

予來湘中，見故家遺帖為多，而有二異，此書與趙潭州所藏黃門論章子厚罷樞密疏也。諫疏在省中，不知何年流落人間，固可異；此書傷觸大臣，宜不為藏，而亦存於今，則尤異耳。書作於元豐元年，於是西方用兵，後四十七年，王蔡為燕山之役，京師遂及於禍，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信哉！信哉！<sup>57</sup>

此跋借蘇書以抒亡國敗家之痛，故家遺帖的背後，實有特殊的文化意義。

在南宋興盛的刻帖風氣下，不少蘇軾書跡亦透過摹刻上石，得以保存與流傳。上文提及的三十卷《西樓蘇帖》，便是所知最早的蘇軾個人集帖。編刻者汪應辰於乾道元年（1164）以敷文閣學士為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到任不久即開始搜訪蘇軾墨蹟，並以「每搜訪所得即以入石」的方式，於乾道四年（1168）刻成《西樓蘇

53 有關岳飛書學蘇軾，岳珂嘗有提及：「先王夙景仰蘇氏筆法，縱逸大槩，祖其遺意」、「始先生在兵間，獨以垂意文藝稱，字尚蘇體」，分見〈鄂忠武王書簡帖〉、〈黃魯直先生賜帖〉，載岳珂，《寶真齋法書贊》，卷28，頁7下；卷15，頁2上。

54 岳珂，〈跋蘇文忠蕭丞相樓二詩帖〉：「先君述先生之遺意，喜收坡帖。」《寶真齋法書贊》，卷12，頁20下。

55 岳珂，〈跋蘇文忠金丹帖〉，《寶真齋法書贊》，卷12，頁9。

56 岳珂，〈蘇文忠大字詩帖贊〉，《寶真齋法書贊》，卷12，頁19下。

57 陳傅良，〈跋東坡與章子厚書〉，載陳傅良撰、曹叔遠編，《止齋集》，卷42，頁2上。

帖》，置於制置使官署中的西樓。<sup>58</sup>蘇軾是四川人，成都是其故地，故此集帖既保存了蘇軾大量書跡，亦體現蜀地微妙的文化淵源。除此三十卷《西樓蘇帖》外，文獻亦載有另一十卷本的《西樓蘇帖》，可能亦是汪應辰所刻。<sup>59</sup>《西樓蘇帖》於南宋時已頗為著名，陸游對之尤為寶愛，其愛不釋手的《東坡書髓》，便是從十卷本的《西樓蘇帖》選編而成。《西樓蘇帖》為個人集帖，其他南宋所刻的歷代集帖與斷代集帖，例如《群玉堂帖》（圖5）、《鬱孤臺法帖》（圖6）、《鳳墅帖》等，皆收有蘇軾書跡。此外，一些散見於文獻的記載，例如周必大（1126-1204）於淳熙十二年（1185）二月清明節，就蘇軾的〈代張文定公上書〉跋云：「真蹟今藏會稽薛氏，而同郡石氏安摹刻之」，又如上文所述，陸游勸其友施宿將所藏的一幀蘇軾書札上石等，都透露出南宋摹刻蘇軾書跡風氣的點滴。<sup>60</sup>可以相信，蘇書在南宋的摹刻數量，必定遠較目前所知者為多。

保存蘇軾著作遺墨，並將之傳播發揚，只是南宋文化的一鱗半爪。在「渡江文物，追配中原」的情結下，南宋人對於北宋傳統的繼承，可謂不遺餘力。編刻北宋文集，在南宋固然蔚然成風，而南宋所摹刻的法帖，亦以北宋書跡為多。以個人集帖而論，除了前述的蘇軾《西樓蘇帖》外，還有歐陽修的《六一先生帖》與《歐陽公集古錄跋尾》，黃庭堅的《山谷先生帖》，米芾的《紹興米帖》、《英光堂帖》、《松桂堂帖》（圖7），蔡襄的《蔡君謨帖》等，另外如《曲江帖》為北宋文人書法集帖，《荔枝樓帖》與《鳳墅帖》為宋人法帖，加上其他叢帖所收者，均可見南宋對北宋書跡旁搜博採之功。

此外，綜觀南宋刻帖，除摹刻大量北宋遺墨外，另一特點是出現不少南宋人墨跡。此現象固然反映南宋刻帖活動興盛，以致無論古今書跡，亦為人所樂於摹勒，但同時亦可見在靖康之難的文化浩劫後，宋人的憂患意識令本朝文化的保存與延續倍受重視。曾宏父於嘉熙（1237-1240）至淳祐（1241-1252）年間所刻的《鳳墅帖》是最為典型之例。此帖為斷代帖，規模龐大，共四十四卷，分「前帖」與「續帖」各二十卷，另附書帖、題咏各二卷，所收皆為兩宋名人書法，除了如蘇、黃、米、蔡等書法大家外，更包括甚多不以書法鳴世的政治、文化、學術名人墨跡，按

58 有關《西樓蘇帖》的討論，參見蔡鴻茹，〈關於宋拓本《西樓蘇帖》（《東坡蘇公帖》）〉，載中國法帖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法帖全集》，冊6，頁1-10。

59 現藏於北京市文物公司的《東坡蘇公帖》殘本，可能為此十卷本之物。參見蔡鴻茹，〈關於宋拓本《西樓蘇帖》（《東坡蘇公帖》）〉，載中國法帖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法帖全集》，冊6，頁3-4。

60 周必大，〈跋東坡代張文定公上書〉，載周必大撰、周綸編，《文忠集》，卷18，頁6上。

其分類的南宋人帖，有「南渡廷魁帖」、「南渡執政帖」、「南渡文藝帖」、「南渡詩文題跋」、「南渡將相名賢帖」（圖 8）、「南渡儒行帖」等，其用意明顯不只在於傳揚書法。曾宏父曾詳述摹刻《鳳墅帖》的始末，就「前帖」云：

（《鳳墅帖》）二十卷，嘉熙、淳祐間勒石寘吉州鳳山書院，七年乃成……悉本朝聖君名臣真筆目所見者。若夫異代字蹟，則前賢鐫刻已備，展轉謄模，愈失其真，且亦欲類吾宋三百年間書法，自成一家，以傳無窮。古刻皆存桓溫、王處仲字，意有所在，予亦不敢削巨，姦遺墨以戾前志，蓋視古帖亦猶續通鑑云爾。<sup>61</sup>

除了將墨跡傳於後世，以彰顯有宋一代的書法成就外，《鳳墅帖》的摹刻更帶有以史為鑑的用意。就「續帖」則跋云：

自惟藏拙楚墅，踰二十載，掛冠又已十年，衰頹八袞，豈能更出門戶。家藏者，裒鑄無遺，鄉之故家，轉假亦竭，士夫經從，各有好尚，有亦罕攜自隨。儻絕筆以竣後人，誰其同志。不若參取奎畫名墨，表表在人耳目。帖所缺者，緝而繼之。不敢執初志，以不見真墨而略，庶可備皇朝文物之盛。<sup>62</sup>

曾宏父搜羅宋人書跡可謂鞠躬盡瘁，其「庶可備皇朝文物之盛」的抱負，正是南宋刻帖精神的寫照。

## 四、南宋書風

在傳統書學中，除了以歷代大師為評論對象外，時代風格亦往往成為書史回顧的關注點，尤其是當董其昌（1555-1636）提出「晉人書取韻，唐人書取法，宋人書取意」的觀點後，此現象更為普遍。<sup>63</sup>然而，時代書風形成的因素異常複雜，改朝換代雖然常為書風帶來改變，但亦不可一概而論，何況像南宋只是南渡偏安，並非真正的朝代更替。<sup>64</sup>在南宋文人眼中，中原淪陷雖然是政治現實，但無論是王朝道統，或是文化根源，南宋都與北宋一脈相承，並無間斷。因此，從文化角度而言，南宋書風上承北宋實是理所當然，而且在文化中興的前提下，重建、保存、繼

61 曾宏父，〈鳳墅帖〉，《石刻鋪敘》，卷下，頁 7 上-8 上。

62 曾宏父，〈續帖〉，《石刻鋪敘》，卷下，頁 9。

63 董其昌，〈書品〉，《容臺集·別集》，頁 1890。

64 有關時代書風的討論，參見傅申，〈時代風格與大師間的相互關係〉，《書法研究》，1992 年第 1 期（總 47 輯），頁 1-20。

承變得至為重要，而書風傳承的意義更顯深遠。

陸游於淳熙元年（1174）跋蔡襄書跡云：「近歲蘇、黃、米芾書盛行，前輩如李西臺、宋宣獻、蔡君謨、蘇才翁兄弟，書皆廢」，道出了當時書壇的面貌。<sup>65</sup>北宋以蘇、黃、米為書壇巨擘，三家書風於北宋後期已經風行，至南宋更成為故家傳統中的書法典範。傳世的蘇軾〈寒食帖〉（圖9）、〈前赤壁賦〉（圖10）、〈民師帖〉（上海博物館藏），黃庭堅〈花氣薰人帖〉（圖11）、〈諸上座〉（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致景道十七使君札及詩〉（圖12）、〈寒山子龐居士詩〉（圖13）〈贈張大同卷〉（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博物館藏）、〈經伏波神祠詩〉（日本東京細川護立氏藏）、〈松風閣詩〉（圖14），米芾〈苕溪詩〉（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草書九帖〉（大阪市立美術館藏）等，均有南宋印鑑或南宋人跋語，是三家書跡流傳於南宋的實例。從時間來說，延續三家書風以南宋前期為最盛，蓋此期書家不少乃是隨著宋室南渡而來，惟即使到了中、晚期，北宋遺踪仍然到處可見。舉其要者，南宋學蘇者有趙令時（1061-1134）、楊時（1053-1135）、翟汝文（1076-1141）、蘇遲（?-1155）、孫覲（1081-1169）、富直柔（1084-1156）、向子諲（1085-1152）、沈與求（1086-1137）、韓世忠（1089-1151）、張浚（1097-1164）、王之望（1102-1170）、岳飛、韓璜（紹興元年〔1131〕御史）、虞允文（1110-1174）（圖15）、葉衡（1114-1175）、尤袤、陸游、謝諤（1121-1194）等；學黃者有宋高宗、胡安國（1074-1138）、朱勝非（1082-1144）（圖16）、張九齡（1092-1159）、王十朋（1112-1171）、王淮（1126-1189）、范成大（1126-1193）等；學米者則有米友仁（1074-1151）、王升（1076-1150後）、劉燾（1071?-1131?後）、李彭（生卒不詳）、胡沂（1107-1174）、米巨宏、張孝祥（1132-1169）、吳琚（圖17）、趙孟堅（1199-約1264）等。<sup>66</sup>嚴格來說，如此歸類乃是權宜之法，只能反映梗概，蓋古代學書者多不囿於一家，而作品亦未必只顯露單一淵源，例如宋高宗學黃庭堅後，嘗取法米芾，最後始歸於六朝（圖18）；范成大有「字學山谷米老」的記載，並於黃、米之外，兼學蔡襄、蘇軾，甚至楊凝式（873-954）等（圖19）。<sup>67</sup>然而，南宋書法以蘇、黃、米三家為主要基調，確是頗為明顯的時代特色。傳世《鳳墅帖》殘本中所見的南宋手跡，風格時有蘇、黃、米遺韻，便足以說明三家書風的普及程度。

65 陸游，〈跋蔡君謨帖〉，《渭南文集》，卷26，頁13下。

66 有關南宋書家延續北宋的概述，參見方愛龍，《南宋書法史》，第1章至第3章。

67 有關宋高宗的書法，參見朱惠良，〈南宋皇帝書法〉，《故宮學術季刊》，2卷4期（1985夏），頁17-51。范成大學山谷米老，見董史，《皇宋書錄》，載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2》，頁642。亦參見方愛龍，《南宋書法史》，頁129-131。

北宋三家書風盛行，除了是以大師為宗的傳統學書觀念使然外，亦是南宋人以翰墨寄托文化價值與理想的結果。比較上，南宋學蘇的人最多，究其原因，相信是由於蘇軾書風不僅是一種審美的選擇，同時更是人格風範的楷模。北宋時，士大夫評書已喜將人品與書品相提並論，認為書法足以觀人，墨跡以賢者為貴。南渡後，宋人深受佞臣誤國之痛，對於道德情操倍感重視，故於書法，更有「夫論書，當論氣節」的標準。<sup>68</sup>對南宋文人來說，蘇軾忠義之氣與豁達的人生觀，無論入世或出世，都是故家風範的完美典型。李流謙（1115年進士）曾謂：「自有文章以來，未有若東坡先生者也。其人非特雄於翰墨，忠義之節，勁果之氣，橫絕古今。觀其立朝尊君親上之心根于天性」，此等讚譽，大體概括了南宋文人心中的蘇軾形象。<sup>69</sup>因此，當南宋人評論蘇軾遺墨，往往會由書風而及人品氣節，敬慕之心亦油然而生。張栻（1133-1180）就蘇軾書跡的一段跋語，最能說明蘇軾書法背後的人文道德價值：

坡公結字穩密，姿態橫生，一字落紙，固可藏玩，而況平生大節如此哉。竊嘗觀公議論，不合於熙豐，固宜。至元祐初，諸老在朝，群賢彙征，及論役法，與己意小異，亦未嘗一語苟同，可見公之心惟義之比，初無適莫也。方貶黃州，無一毫挫折意，此在他人已為難能，然年尚壯也。至於投老炎荒，剛毅凜凜，略不少衰，此豈可及哉。范太史家藏公舊帖，其間雖有壯老之不同，然忠義之氣，未嘗不蔚然見於筆墨間也，真可畏而仰哉。<sup>70</sup>

類似的評論角度，於南宋著作中到處可見，即使是曾經批評蘇軾書法的朱熹（1130-1200），亦不免稱許云：「東坡筆力雄健，不能居人後，故其臨帖物色牝牡，不復可以形似校量，而其英風逸韻，高視古人，未知其孰為後先也。」<sup>71</sup>在學蘇的書家中，陸游亦有相近的評語：「公不以一身禍福，易其憂國之心，千載之下，生氣凜然，忠臣烈士所當取法也。」<sup>72</sup>此跋為其觀賞施宿所藏東坡帖時所書，字裏行間皆以蘇軾的人品氣節為重。陸游書法博取眾益，但氣息與蘇書最為接近，其中又以書札最具蘇軾筆意。（圖 20）宋人書札，往往信手揮就，不問工拙。陸游在隨

68 費袞，〈論書畫〉，《梁谿漫志》，卷 6，頁 16 上。

69 李流謙，〈與鄭擇可辨屬字書〉，《澹齋集》，卷 10，頁 6 上。

70 張栻，〈跋東坡帖〉，載張栻撰、朱熹編，《南軒集》，卷 35，頁 3。

71 朱熹，〈跋東坡帖〉，《晦庵集》，卷 84，頁 26 下。朱熹：「字被蘇、黃胡亂寫壞了，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載朱熹撰、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40，頁 20 下。

72 陸游，〈跋東坡帖〉，《渭南文集》，卷 29，頁 3。

意書寫下，書風與蘇軾契合，正是他偏愛蘇軾書法所致。從選編《東坡書髓》，至「三十年間未嘗釋手」，陸游已不僅視蘇軾書法為臨摹取法之源，更重要者，是可從中得到與故家傳統相連的文化認同。陸游一生憂國傷時，以收復故土為己任，書法學蘇，其背後的意義不言而喻。

黃庭堅書法之於南宋，亦可作如是觀。他與蘇軾同被列為元祐黨人，二人詩文同為朝廷所嚴禁，及南渡後，於建炎（1127-1130）年間已出現《豫章集》的編訂，其後黃庭堅著作的其他編集以至其年譜，於南宋陸續出版，情況與蘇軾相類。<sup>73</sup>毋庸置疑，黃庭堅的遺墨亦成為南宋人樂意收藏的故家文物。周必大曾跋黃庭堅帖曰：「右友人曾無疑所藏太史黃公帖……自崇觀以後，凡片文隻字，禁切甚嚴。至炎興間，則雖宸翰猶俯同其筆法。蓋一弛一張，人事也，抑或舉有天道焉。觀三代兩漢以來，彝器碑刻，沉埋蝕泐之後，傳寶百世，何獨公遺墨與。」<sup>74</sup>此跋以黃庭堅遺墨等同古代彝器碑刻，具有流傳百世的價值，道出黃庭堅書風於南宋初年盛極一時，甚至皇帝亦倣效其筆法。宋高宗早年學黃庭堅書法之事，文獻中不乏記載，其傳世拓本〈佛頂光明塔碑〉（圖 21）是最佳實證。<sup>75</sup>此作無論是結字或用筆，皆取法山谷，亦步亦趨，難怪周必大跋高宗書法時有「德壽皇帝中興初，肆筆使入神品，庭堅書法，特筌蹄耳」之語。<sup>76</sup>一如蘇軾，黃庭堅書風於南宋盛行，除了北宋遺風的因素，亦在於山谷德藝雙修，人書皆貴。故張孝祥說：「豫章先生，孝友文章，師表一世，歛唾之餘，聞者興起，況其書又入神品，宜其傳寶百世。」<sup>77</sup>在文學上，黃庭堅所創的江西詩派於南宋風靡一時，其持身處世則端方剛正，「本于天才，變而成家」的山谷書法，由是成為南宋書壇中繼承故家傳統的另一選擇。<sup>78</sup>

「世人競寫襄陽字」，此詩句概括出米芾書風於南宋普及的情況。<sup>79</sup>米芾不僅以筆墨精妙見稱，更是書畫鑑藏的專家，其形象與活躍於政壇、並於文壇開宗立派的蘇、黃迥異，然其代表著故家傳統的意義，則可謂不遑多讓。在南宋初年，高宗嘗

73 有關黃庭堅文集的編刻，參見王嵐，《宋人文集編刻流傳叢考》，頁 196-222。

74 周必大，〈跋曾無疑所藏黃魯直晚年帖〉，《文忠集》，卷 51，頁 2。

75 如樓鑰云：「高宗皇帝自履大位，時當難難，無他嗜好，惟以翰墨自娛。始為黃庭堅書，改用米芾，動皆逼真。」樓鑰，〈恭題汪遠所藏高宗宸翰·御書中庸篇〉，《攻媿集》，卷 69，頁 19 上。

76 周必大，〈建炎御筆跋〉，《文忠集》，卷 16，頁 23 上。

77 張孝祥，〈跋山谷帖〉，《于湖集》，卷 28，頁 3 上。

78 岳珂，〈黃魯直食麵帖〉，《寶真齋法書贊》，卷 14，頁 266。

79 趙蕃，〈觀徐復州家書畫七首〉，《乾道稿·淳熙稿》，卷 17，頁 31 上。

學米書，並對米芾大加讚揚，曰：「以芾收六朝翰墨，副在筆端，故沉著痛快，如乘駿馬，進退裕如，不煩鞭勒，無不當人意。」<sup>80</sup>米芾書法的六朝淵源，隱含著正統傳承的觀念，這無疑是高宗取法並給予高度評價的原因，但其神俊超逸的書風，自具有本身成為經典的條件。除高宗外，米友仁秉承家學，以延續父親書風為己任，其書法雖被評為「不逮其父」，未嘗沒有推波助瀾之功（圖 22）。<sup>81</sup>事實上，米友仁得高宗重用，為內府所藏法書名畫進行鑑定，其中包括大量米芾遺墨，間接促成了《紹興米帖》的刊刻，在南宋初年的艱難時候，對於米芾「傳統」的形成，至為有益。其後米芾曾孫米巨容亦克紹箕裘，書風恪守米家傳統，更於淳熙十五年（1188）以米芾書跡勒石，刻成《松桂堂帖》，以傳揚家學。<sup>82</sup>對其他南宋人來說，米芾既集古法之大成，屬書統正脈，又能以其「如天馬脫銜，追風逐電」之書風，自成一派，正足以體現出故家文化的輝煌成就，故於蘇、黃以外，成為「追配中原」的理想模範。「字中有筆米博士，片紙人間什襲藏」、「寶晉之字，幾滿天下」，這些記述正可為南宋時期米芾書法大行其道下一註腳。<sup>83</sup>

蘇、黃、米三家書法是北宋後期興起的潮流，強調個性、以意為尚，開闢了宋代書法的新時代。在政局急促的改變下，此新潮於南宋迅速成為故家文化中的經典傳統，為書家所致力保存、學習與發揚。陸游所指「近歲蘇、黃、米芾書盛行」的現象，正是南宋書壇回應政治與文化遽變的結果。或許從藝術本身的發展規律而言，新興潮流必然有其持續性，故無論怎樣，蘇、黃、米三家書風都必會風行一段時間，然而，在南宋偏安的情境下，三家書法的意義已不只在於風格潮流或審美時尚，更重要的是在於筆墨背後所蘊含的故家淵源與文化價值。在時間上，南宋偏安超過一個半世紀，書法的發展難免有所變化，例如在南宋末年趙孟堅由唐入晉的學書主張，便是以唐法建立「間架牆壁」，以矯當時書法欹側過甚之弊。<sup>84</sup>惟觀趙孟堅的傳世書跡（圖 23），仍依稀可見蘇軾與米芾的氣息，而趙氏平生喜與金石書畫為

80 宋高宗，《翰墨志》，頁 3。

81 有關米友仁繼承及發揚其父書法的論述，參見石慢，〈克盡孝道的米友仁——論其對父親米芾書跡的搜集及米芾書跡對高宗朝廷的影響〉，《故宮學術季刊》，9 卷 4 期（1992 夏），頁 89-126。魏了翁：「元暉雖不逮其父，然如王謝家子弟，竟自有一種風格也。」魏了翁，〈跋米友仁帖〉，《鶴山集》，卷 62，頁 19 上。

82 《松桂堂帖》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參見中國法帖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法帖全集》，冊 12。

83 張棧，〈和答鄭憲分贈米帖〉，《南軒集》，卷 7，頁 1 下。王柏，〈寶晉小楷跋〉，《魯齋集》，卷 11，頁 6 上。

84 有關趙孟堅的書學主張，見其〈論書法〉，載崔爾平編，《歷代書法論文選續編》，頁 155-159。

伴，更是倣效米芾書畫船的風雅。<sup>85</sup> 或可以說，「追配中原」的情結雖然以南宋前期最盛，但影響所及，南宋整朝書風都離不開以蘇、黃、米為代表的故家傳統。即使是經典的魏晉傳統、正氣凜然的顏真卿（709-785）、被蘇軾譽為本朝第一的蔡襄等，都曾經為南宋書家所效法，但在具體的書風影響上，還是難與北宋三家相提並論。<sup>86</sup>

## 結 語

靖康之難，宋室南渡，對宋人來說是一場翻天覆地的浩劫。在偏安一隅的形勢下，文化重建既是宋室顯示正統的必要政策，亦是文人重拾尊嚴的艱難過程。「渡江文物，追配中原」成為南宋初年的特殊文化情結，而朝野蓬勃的藏書藏帖、刻書刻帖等活動，與這種文化情結密不可分。南宋的收藏與刊刻活動，固然亦建基於當時濃厚的讀書風氣、先進的印刷技術、興盛的出版事業等條件上，但在南宋時人的文化心態而言，這些活動的意義，更在於為本朝文物與傳統，作出保存、整理與發揚。南宋的書法，便是在這種氛圍下表現出「保守」的性格。

在以大師為評論標準的傳統觀念下，南宋乃是一個「衰落」的時期，未能於書法史佔上重要席位。南宋書壇的確沒有出現堪與蘇軾、黃庭堅、米芾雁行的大師，更遑論有新宗派的創建，然而，南宋書法的「保守」卻體現出其獨特的文化底蘊。在承傳北宋三家書風的背後，南宋書家對於本朝文化的認同，對於故家傳統的延續，對於人品氣節的重視，都有足資珍貴的歷史意義。中國書法本就不純粹是審美的問題，南宋書法的價值，亦當從彼時的文化情境作出審視。

85 趙孟堅倣效米家書畫船，見周密，〈子固類元章〉，《齊東野語》，卷19，頁15下-16上。

86 南宋皇室書法算是例外，蓋高宗於學黃、米之後，終服膺於六朝書法，為南宋皇室建立了比較古典的書風。有關宋高宗古典書風的討論，參見莫家良，〈宋高宗與《蘭亭序》——古典書風的回歸〉，載華人德、白謙慎編，《蘭亭論集》，頁393-405。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宋)王明清輯，《揮塵後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3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宋)王柏，《魯齋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86冊。
- (宋)朱熹，《晦庵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45冊。
- (宋)朱熹撰、黎靖德編，《朱子語類》，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02冊，1987。
- (宋)佚名，《宋大詔令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
- (宋)佚名，《悅生所藏書畫別錄》，載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2》，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
- (宋)佚名，《南宋館閣錄續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95冊。
- (宋)佚名，《愛日齋叢鈔》，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54冊。
-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 (宋)李流謙，《澹齋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 (宋)李綱，《梁谿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 (宋)周必大撰、周綸編，《文忠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 (宋)周密，《癸辛雜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 (宋)周密，《齊東野語》，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65冊。
- (宋)岳珂，《寶真齋法書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13冊。
- (宋)施宿等，《會稽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86冊。
- (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 宋高宗，《翰墨志》，叢書集成初編，第1628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 (宋)張孝祥，《于湖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 (宋)張栻撰、朱熹編，《南軒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67冊。
- (宋)陳思，《寶刻叢編》，原刻景印石刻史料叢書乙編之四，上海：藝文印書館，1967。
-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74冊。
- (宋)陳傅良撰、曹叔遠編，《止齋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50冊。
- (宋)陳騭，《南宋館閣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95冊，1987。
-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65冊。
- (宋)陸游，《渭南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63冊。

- (宋) 陸游撰、陸子虛編，《劍南詩藁》，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 (宋) 曾宏父，《石刻鋪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82 冊。
- (宋) 費袞，《梁谿漫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64 冊。
- (宋) 葉夢得，《避暑錄話》，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63 冊。
- (宋) 董史，《皇宋書錄》，載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2》，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頁 642。
- (宋) 趙明誠，《金石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81 冊。
- (宋) 趙孟堅，《論書法》，載崔爾平編，《歷代書法論文選續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頁 155-159。
- (宋) 趙蕃，《乾道稿·淳熙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55 冊。
- (宋) 劉克莊，《後村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80 冊。
- (宋) 樓鑰，《攻媿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53 冊。
- (宋) 鄭虎臣編，《吳都文粹》，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58 冊。
- (宋) 韓澆，《澗泉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80 冊。
- (宋) 魏了翁，《鶴山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73 冊。
- (宋) 羅大經，《鶴林玉露》，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65 冊。
- (宋) 蘇軾，《東坡全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07 冊。
- (元) 馬端臨，《文獻通考》，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14 冊。
- (元) 脫脫等，《宋史》，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83 冊。
- (明) 陶宗儀編，《說郛》，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77 冊。
- (明) 董其昌，《容臺集·別集》，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68。
- (清)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續修四庫全書，第 778 冊。

## 二、近代論著

- 方建新，〈宋代大藏書家葉夢得的藏書活動及其對圖書事業的貢獻〉，載黃建國、高躍新主編，《中國古代藏書樓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9，頁 292-301。
- 方愛龍，《南宋書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王嵐，《宋人文集編刻流傳叢考》，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3。
- 石慢，〈克盡孝道的米友仁——論其對父親米芾書跡的搜集及米芾書跡對高宗朝廷的影響〉，《故宮學術季刊》，9 卷 4 期（1992 夏），頁 89-126。
- 朱惠良，〈南宋皇帝書法〉，《故宮學術季刊》，2 卷 4 期（1985 夏），頁 17-51。
- 何傳馨主編，《文藝紹興——南宋藝術與文化·書畫卷》，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0。

- 林業強，〈宋拓《英光堂帖》考——兼論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第三卷〉，載中國法帖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法帖全集》，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冊10，頁17-35。
- 莫家良，〈宋高宗與《蘭亭序》——古典書風的回歸〉，載華人德、白謙慎編，《蘭亭論集》，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0，頁393-405。
- 傅申，〈時代風格與大師間的相互關係〉，《書法研究》，1992年第1期（總47輯），頁1-20。
- 傅璇琮、謝灼華編，《中國藏書通史》，寧波：寧波出版社，2001。
- 曾棗莊等，《蘇軾研究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
- 程文榮，《南村帖考》，臺北：學海出版社，1977。
- 潘美月，《宋代藏書家考》，臺北：學海出版社，1980。
- 潘銘燊，〈宋代私家藏書考〉，《華國》，第6期（1971），頁201-262。
- 蔡鴻茹，〈關於宋拓本《西樓蘇帖》（《東坡蘇公帖》）〉，載中國法帖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法帖全集》，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冊6，頁1-10。
- 顧志興，《浙江藏書家藏書樓》，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頁31-38。
- 顧志興，《浙江藏書史》，杭州：杭州出版社，2006。
- 顧音海，〈國子監本《閣帖》的刻工問題〉，載陳燮君、汪慶正、單國霖編，《《淳化閣帖》與「二王」書法藝術》，上海：上海博物館，2003，頁59-63。

## **The Northern Song Complex at Play in Southern Song Calligraphy**

Harold Mok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Abstract**

The Southern Song has been considered a period of “declin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alligraphy all because there was an absence of epoch-making masters despite its many celebrated calligraphers and calligraphic works. The “conservatism”, however, was in fact a manifesta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calligraphers’ respect for their dynastic tradition and in turn a cultural phenomenon peculiar to the period. This essay attempts to do justice to Southern Song calligraphy by arriving at an objective evaluation of its significance in a cultural context.

Of the four parts that make up this essay, the first is a discussion of how efforts were made to salvage a culture shattered by the Jingkang Incident in light of the collecting of books and calligraphies. This is followed by an account of the promotion of Song heritage through the publication of books and calligraphic works reproduced by means of carving. The third part explores the esteem of the Northern Song tradition enjoyed among Southern Song literati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craze for Su Shi in the Southern Song. Finally, the cultural implications behind the predominating influences of Su Shi, Huang Tingjian and Mi Fu in Southern Song calligraphy are examined.

**Keywords:** Southern Song calligraphy, Northern Song complex, dynastic tradition, Southern Song carvings of model-calligraphy



圖1 吳說 尺牘 1146-1156年 紙本冊頁 29.8×45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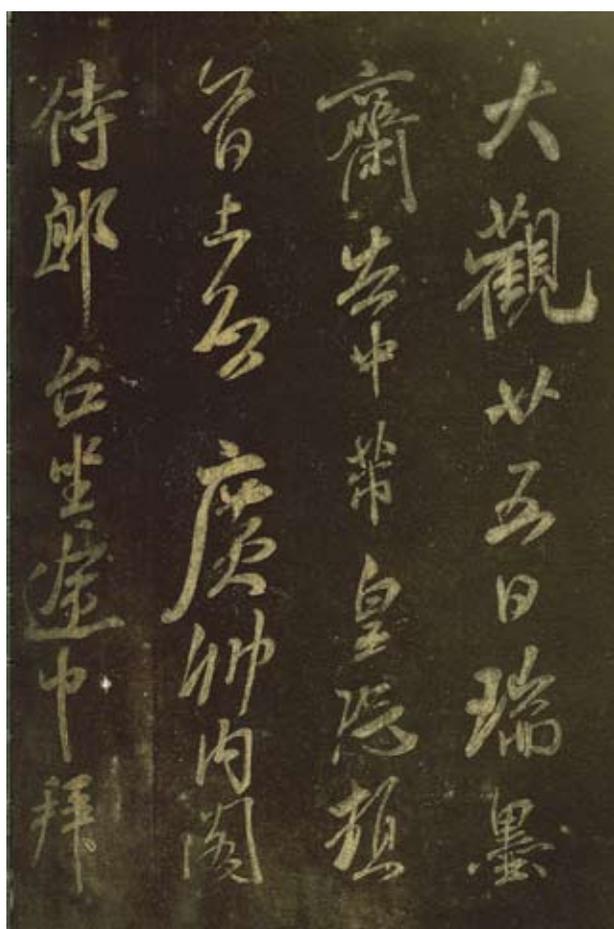


圖2 米芾 與廣帥內閣書 紹興米帖 殘冊 拓本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載《中國法帖全集·5》頁306



草木漸知春萌芽  
靈椿八千歲合抱  
聖主憂民未解顏  
天教瑞雪報豐年  
蒼龍挂濶農祥正  
父老相呼看籍田

圖5 蘇軾 春帖子詞 局部 群玉堂帖 拓本 吉林省博物館藏 載《中國法帖全集·7》頁364

蘇軾孤臺法帖卷第六

取境首再拜孟冬薄寒恭惟



門下侍郎台候方福軾即日蒙免罪  
度之餘

寵命逾分區區尺書豈足

上謝又不敢廢此小禮進退恐栗未暇

侍伏冀

圖6 蘇軾 孟冬薄寒帖 局部 鬱孤臺法帖 卷六 上海圖書館藏 載《中國法帖全集·7》頁3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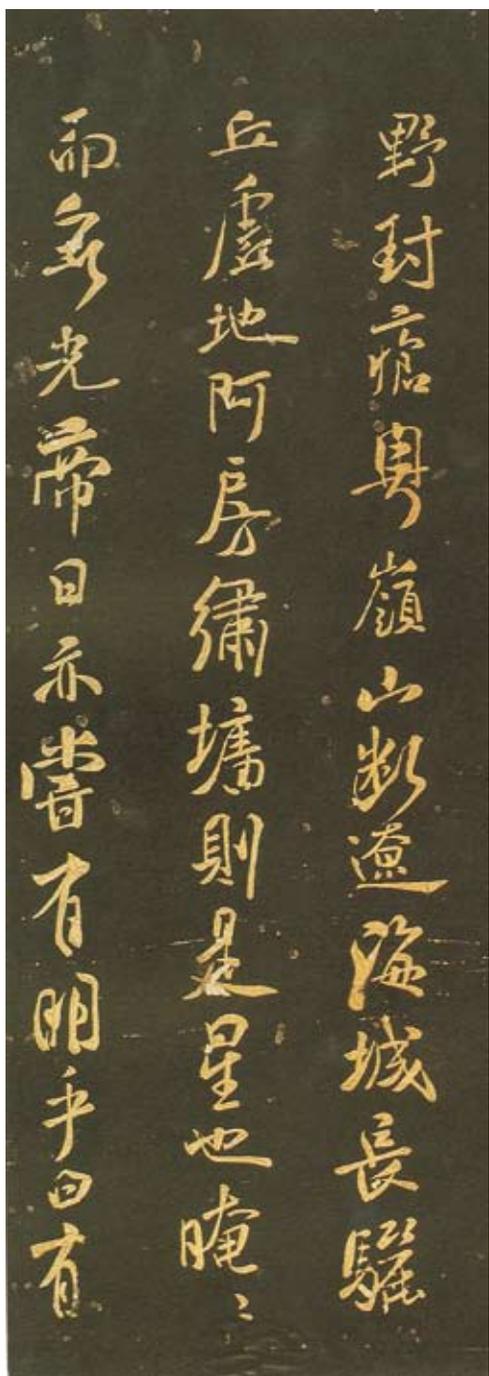


圖7 米芾 參賦 局部 松桂堂帖 拓本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載《中國法帖全集·12》頁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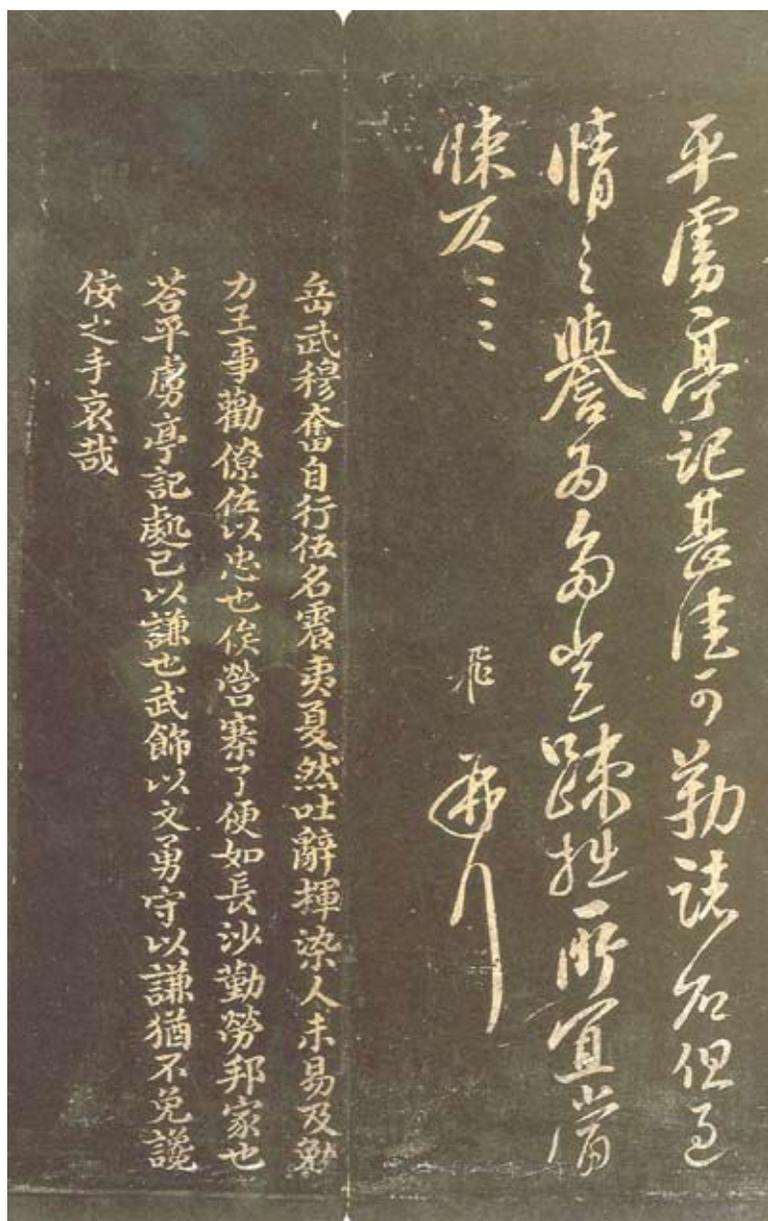


圖8 岳飛 平虜亭記帖（連曾宏父跋） 鳳墅帖·續帖 卷四  
載《中國法帖全集·8》頁1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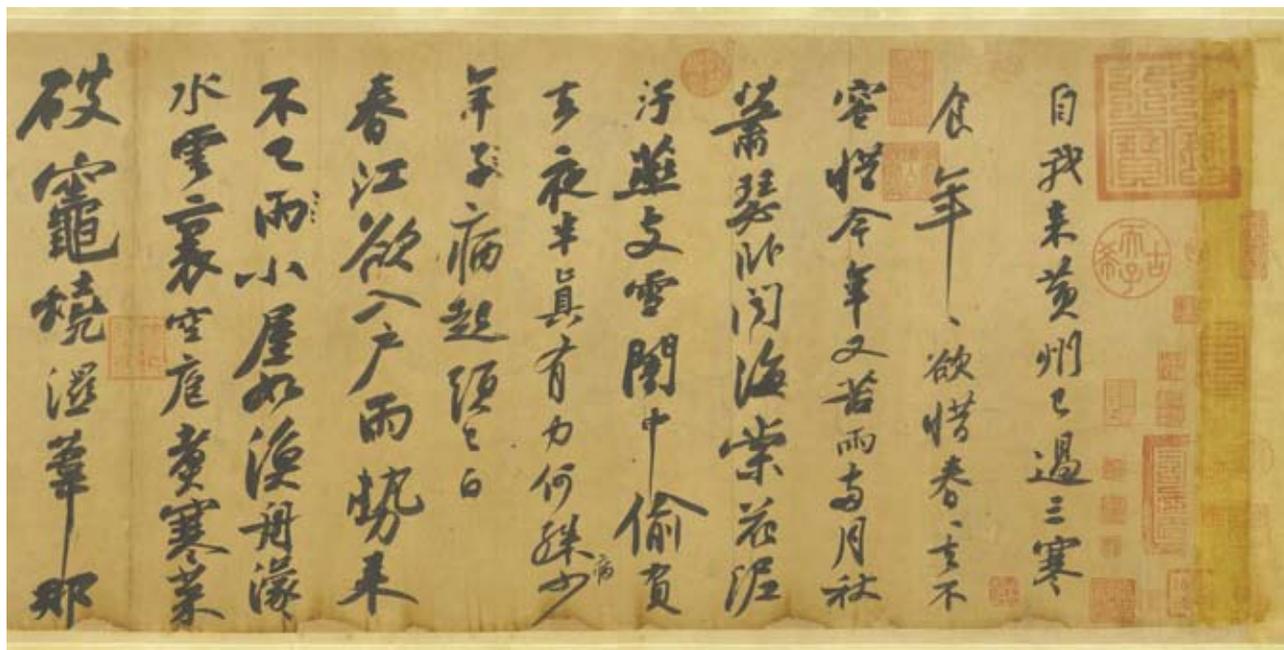


圖9 蘇軾 寒食帖 局部 約1084-1086年 紙本橫卷 34.2×199.5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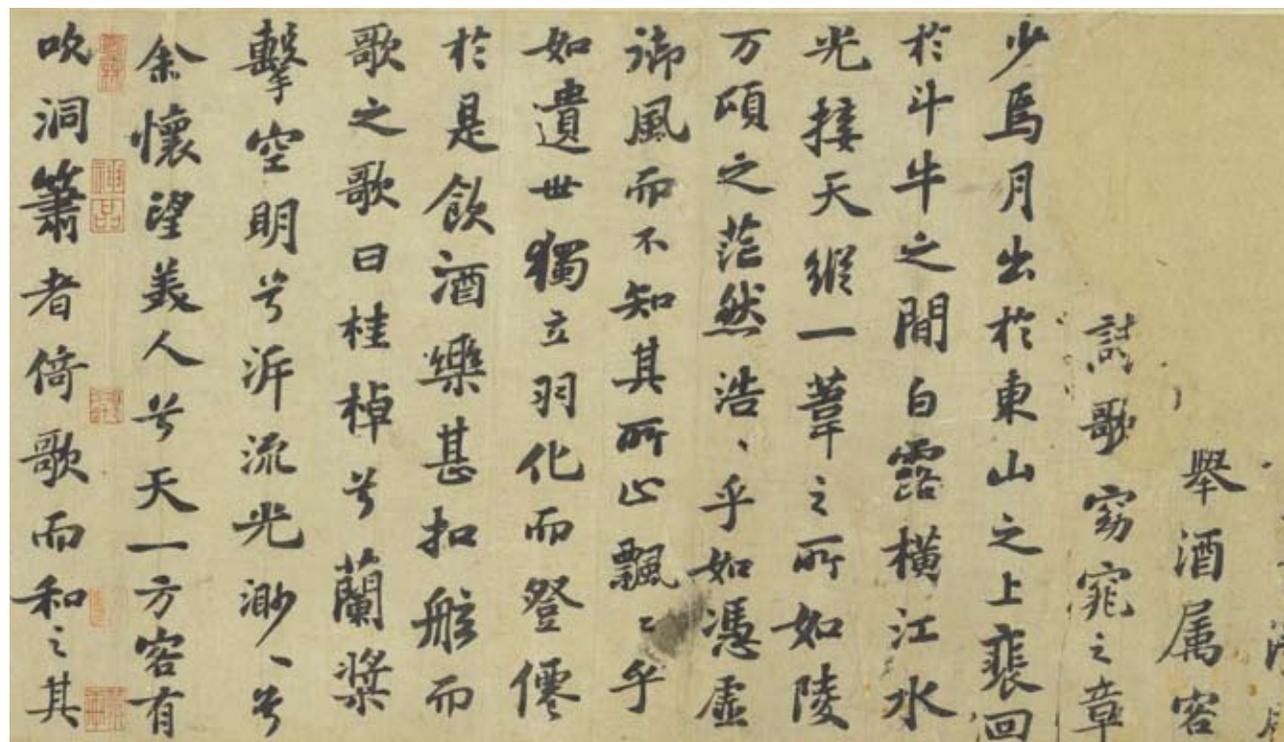


圖10 蘇軾 前赤壁賦 局部 1083年 紙本橫卷 23.9×258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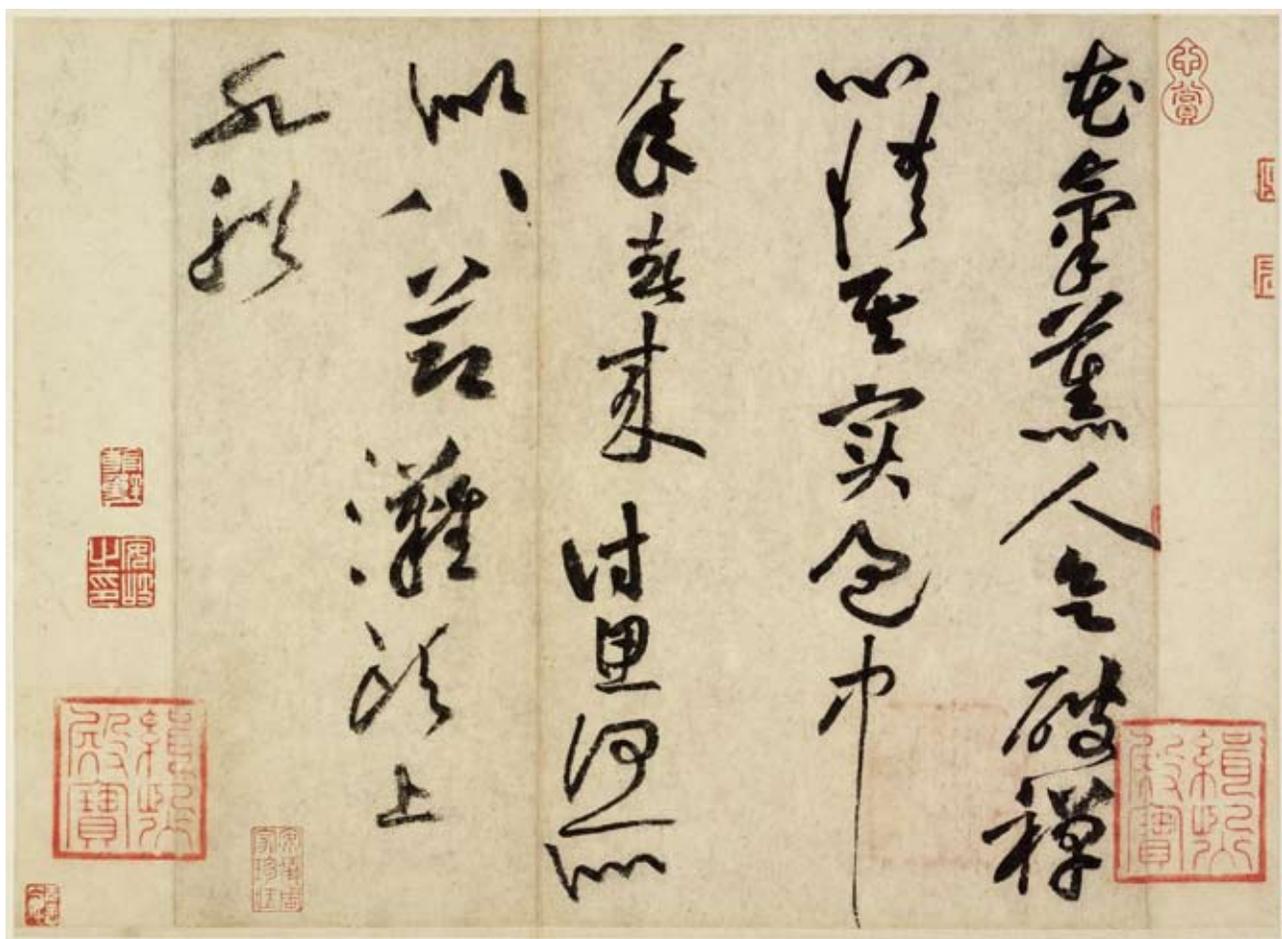


圖11 黃庭堅 花氣薰人帖 1087年 紙本冊頁 30.7×43.2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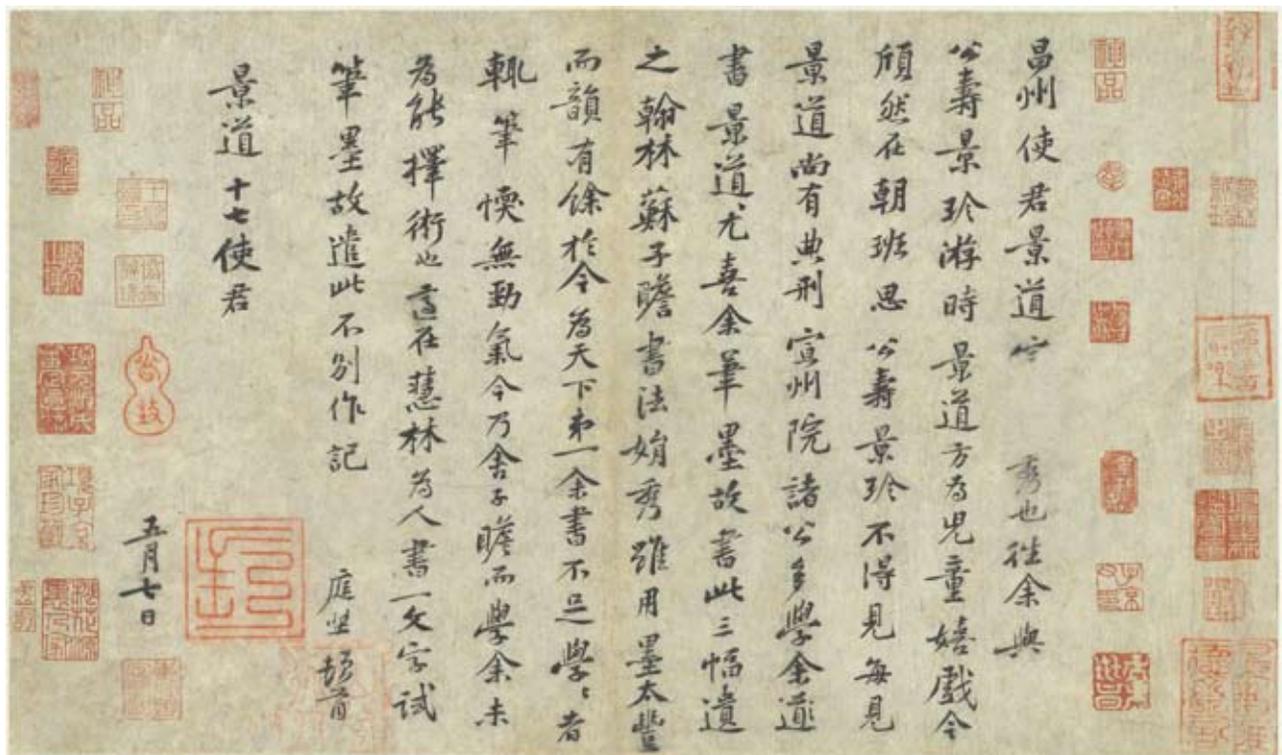


圖12 黃庭堅 致景道十七使君札並詩冊 局部 1089年 紙本冊頁 尺寸不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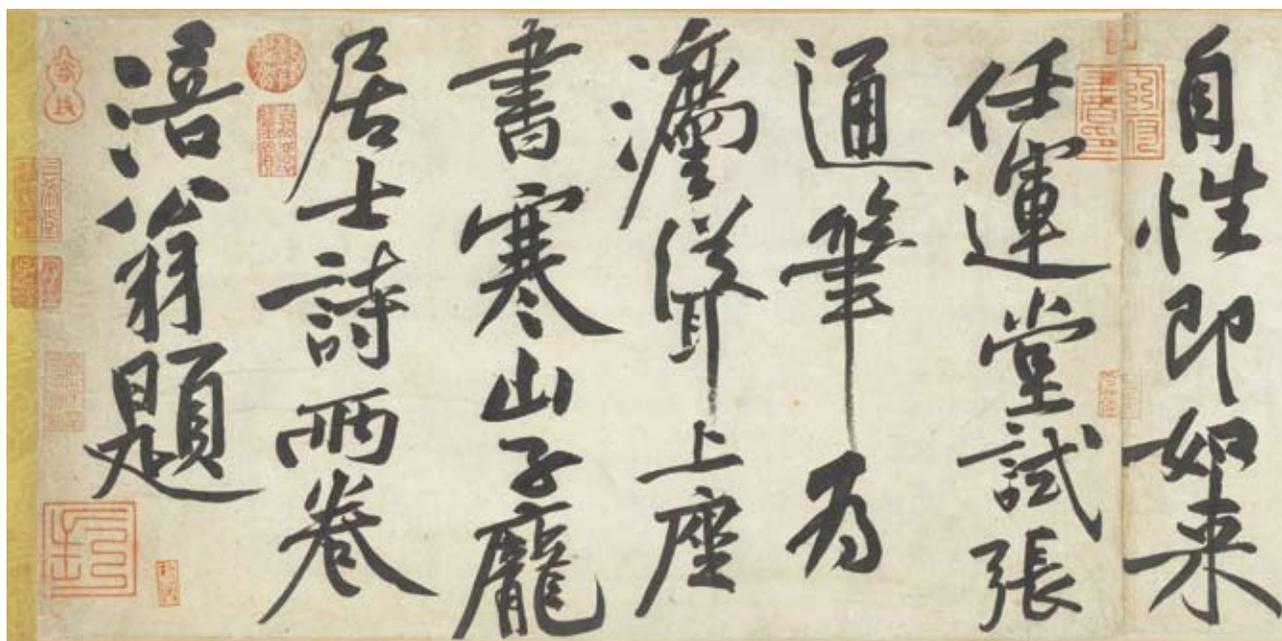


圖13 黃庭堅 寒山子龐居士詩 局部 1099-1100年 紙本橫卷 29.1×213.8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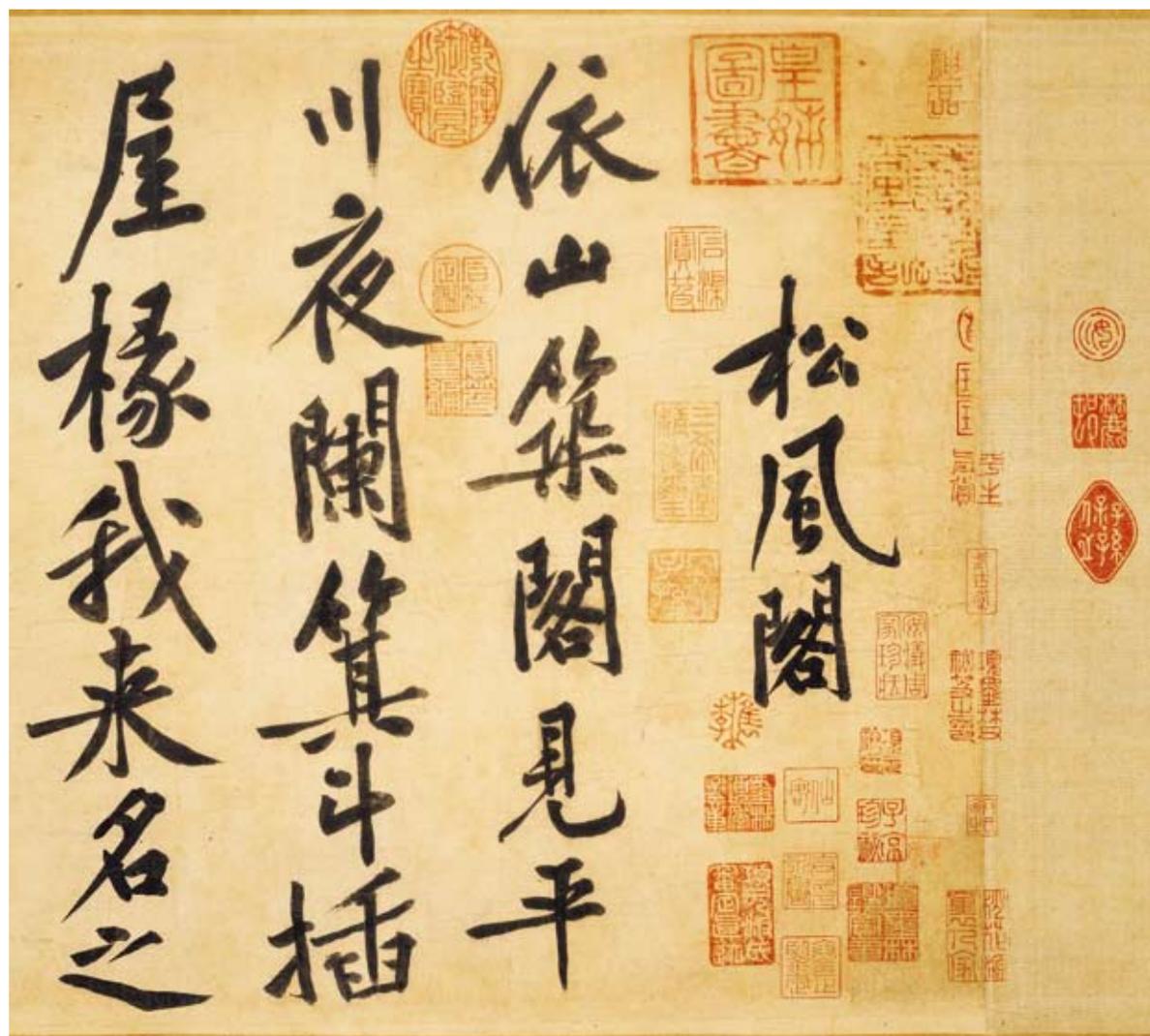


圖14 黃庭堅 松風閣詩 局部 1102年 紙本橫卷 32.8×17.5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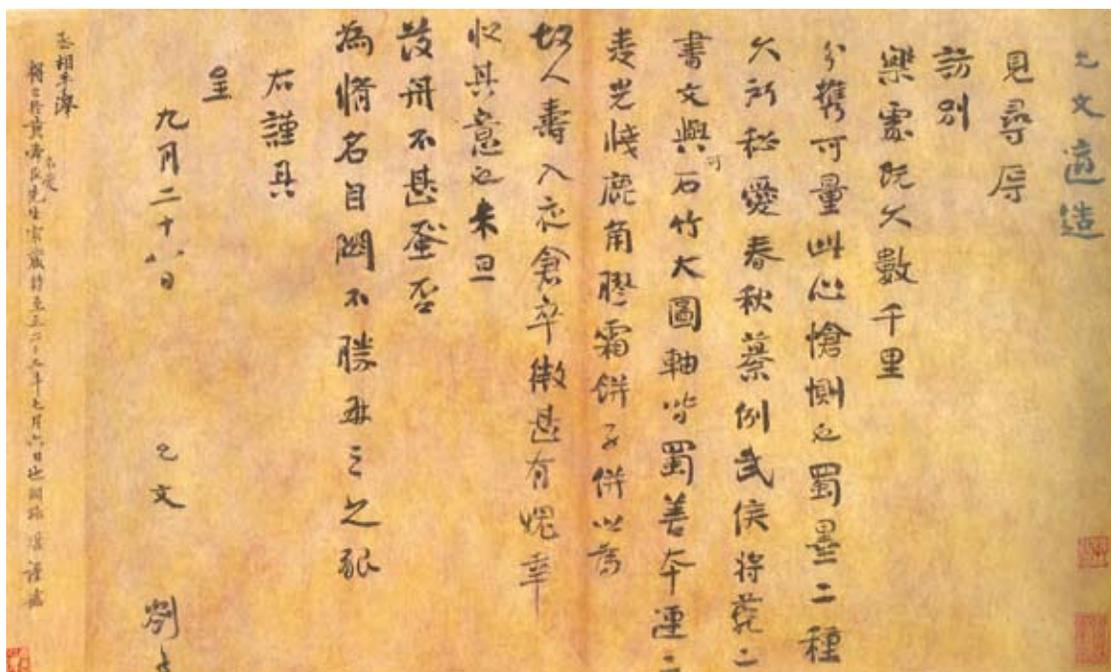


圖15 虞允文 適造帖 約12世紀中期 紙本冊頁 36.8×50.6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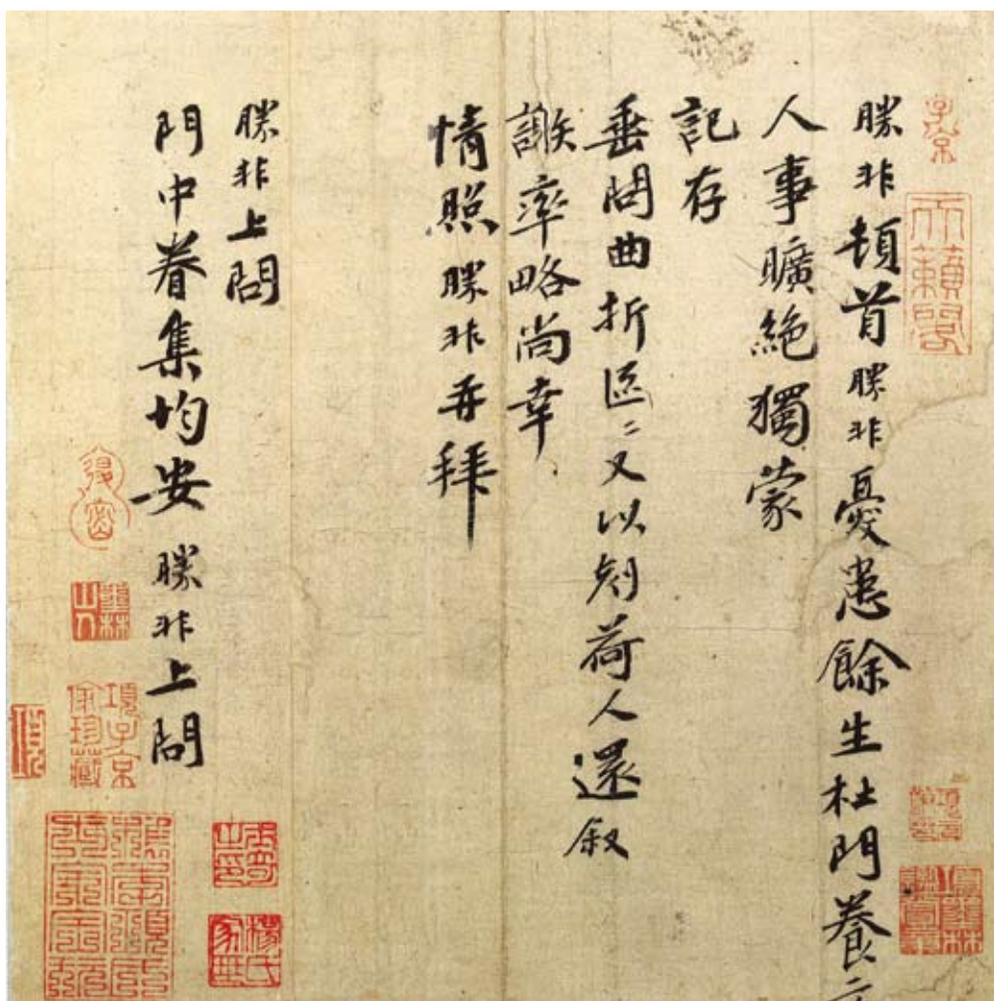


圖16 朱勝非 杜門帖 約1135-1144年 紙本冊頁 28.7×28.6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載《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12·宋代書法》圖版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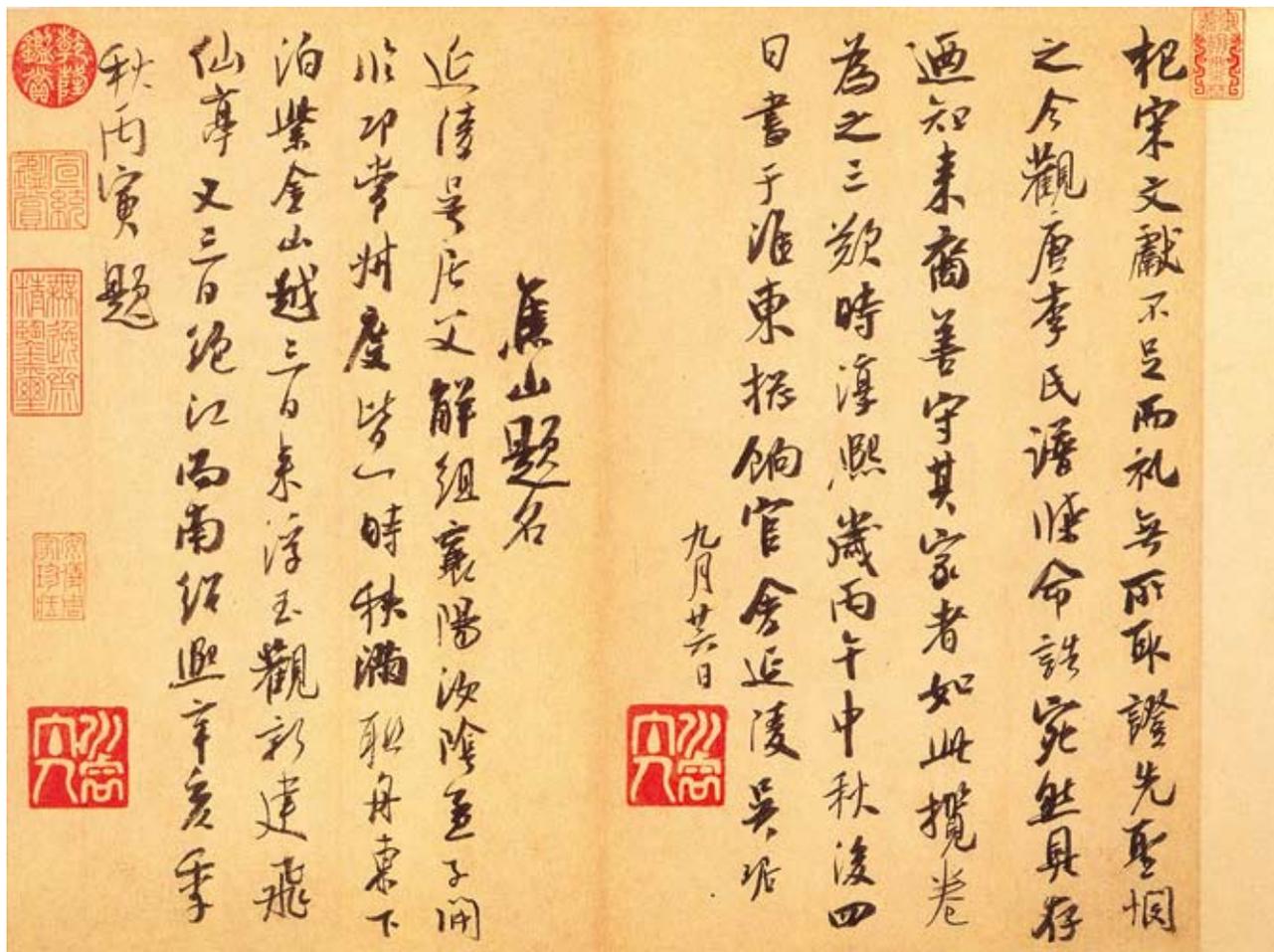


圖17 吳珣 書識語並集山題名 紙本冊頁 31.3×39.4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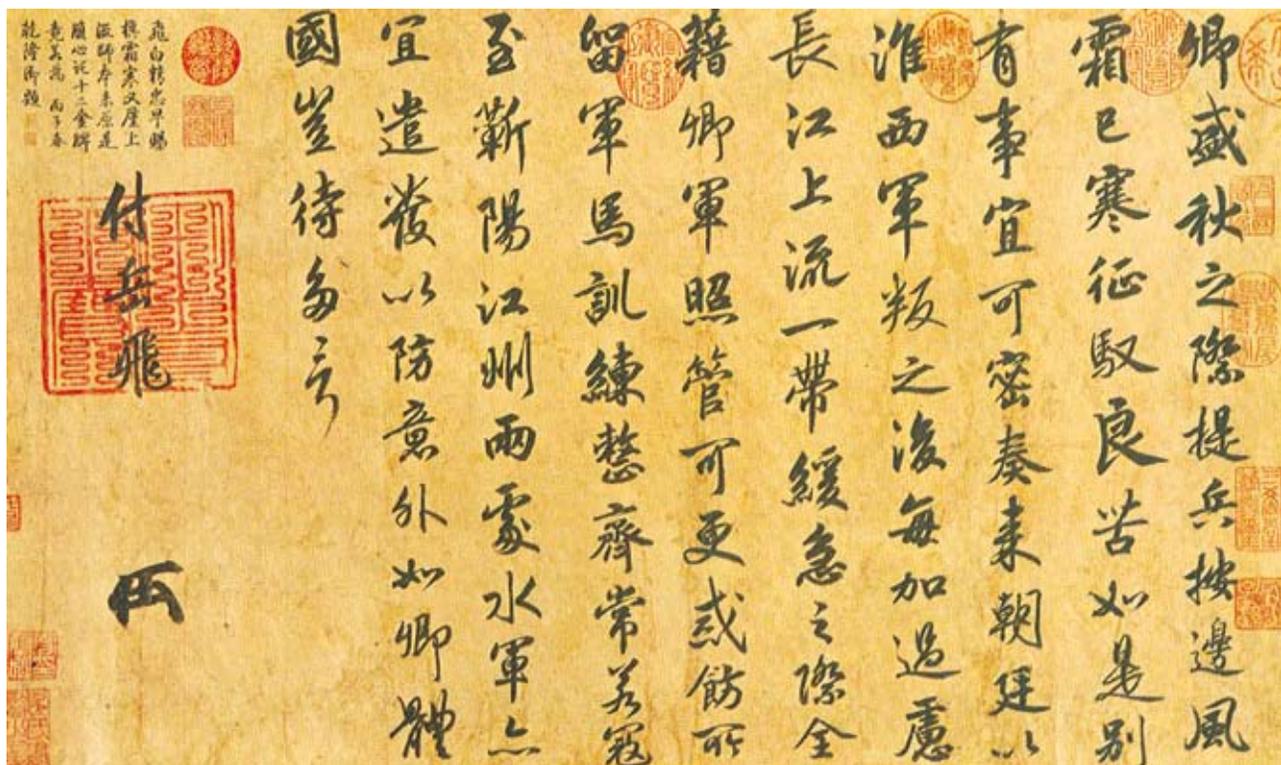


圖18 宋高宗 賜岳飛手敕 1137年 紙本橫卷 36.7×61.5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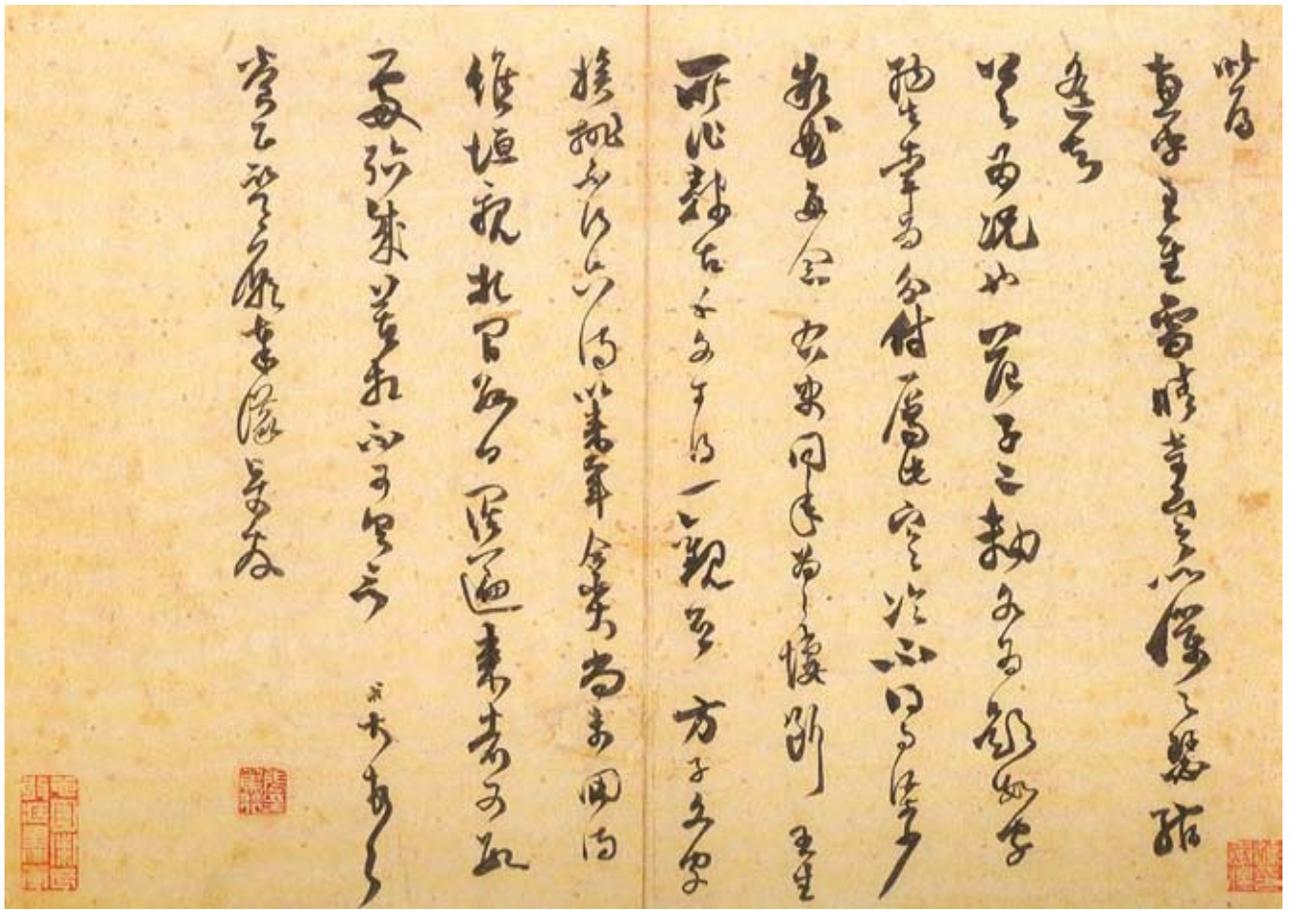


圖19 范成大 雪晴帖 約1190年 紙本冊頁 30.9×43.9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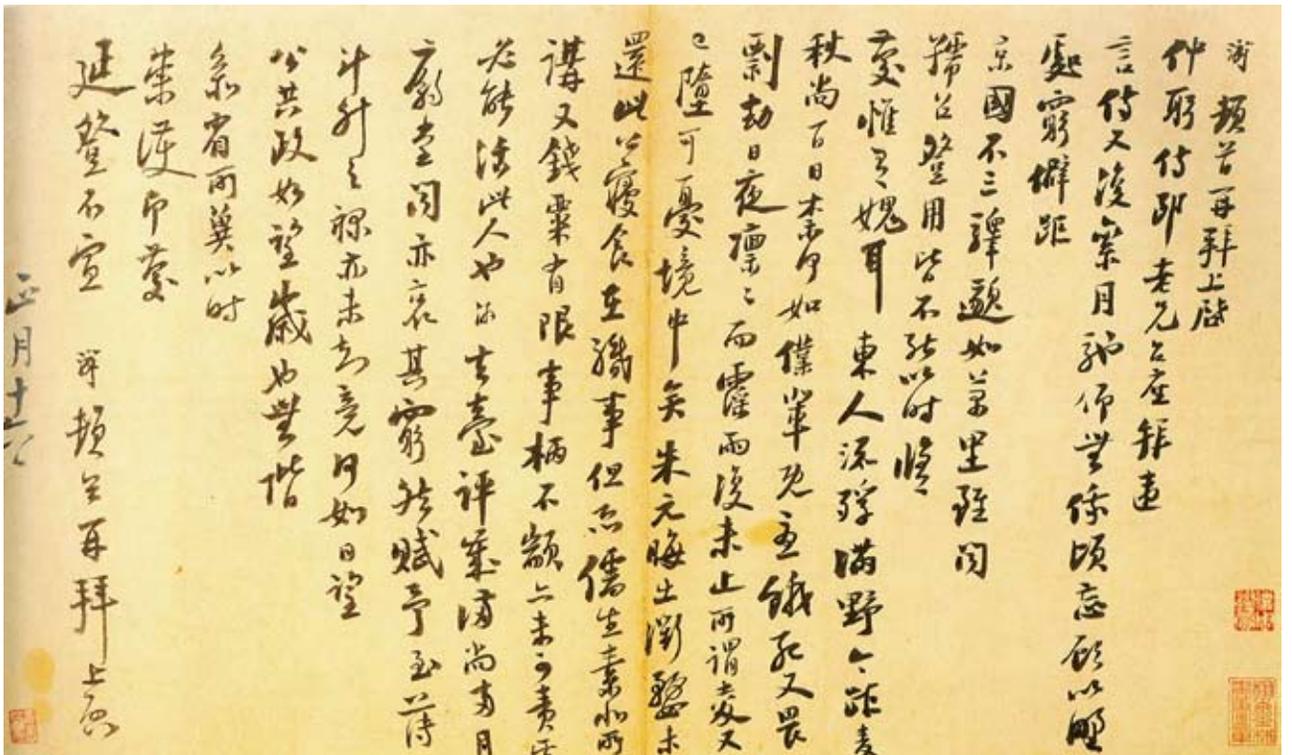


圖20 陸游 致仲躬侍郎尺牘 1182年 紙本冊頁 31.7×54.3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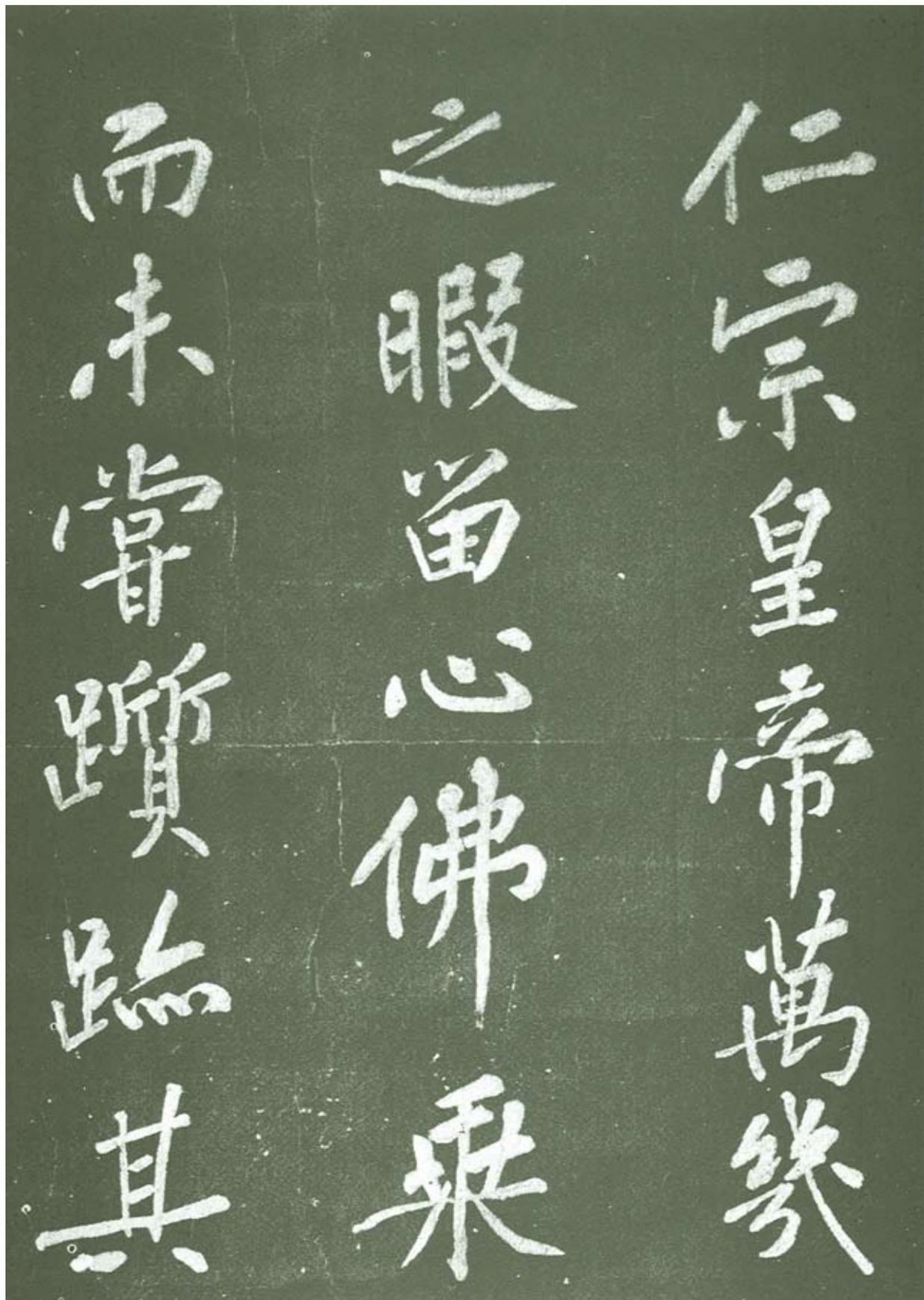


圖21 宋高宗 佛頂光明塔碑 局部 1133年 拓本 175×86.4公分 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 載《書道全集》第11卷 圖版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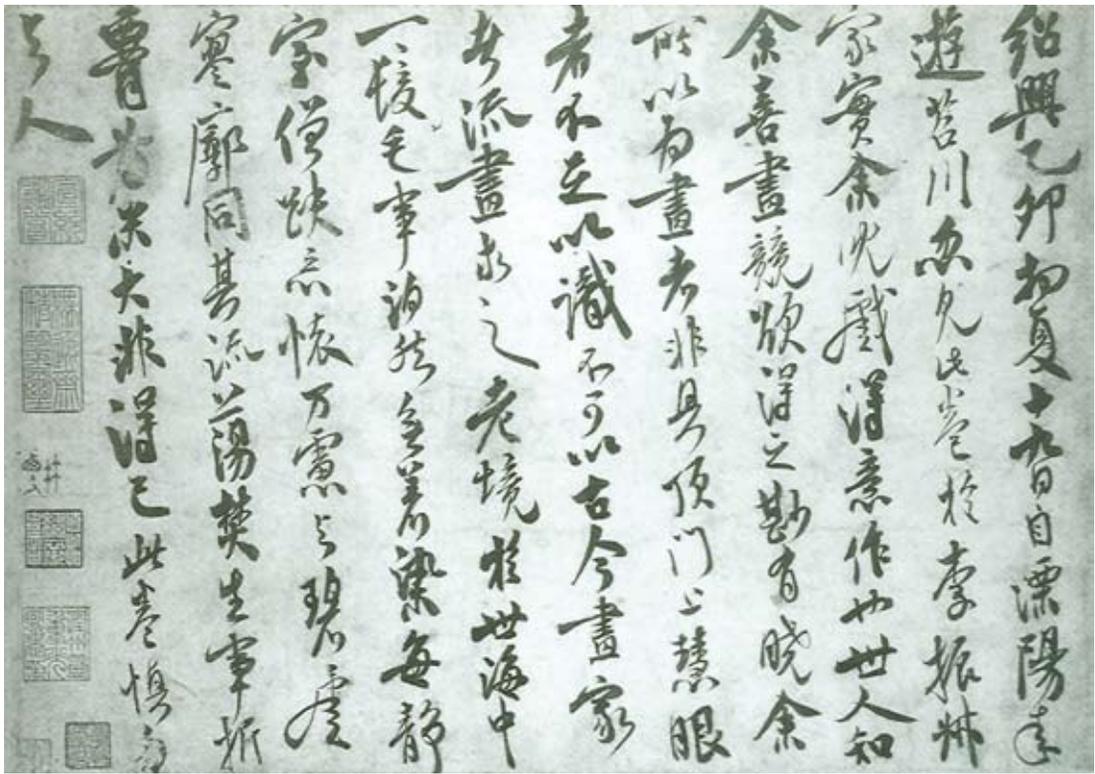


圖22 米友仁 自題雲山得意圖 紙本 29.7×42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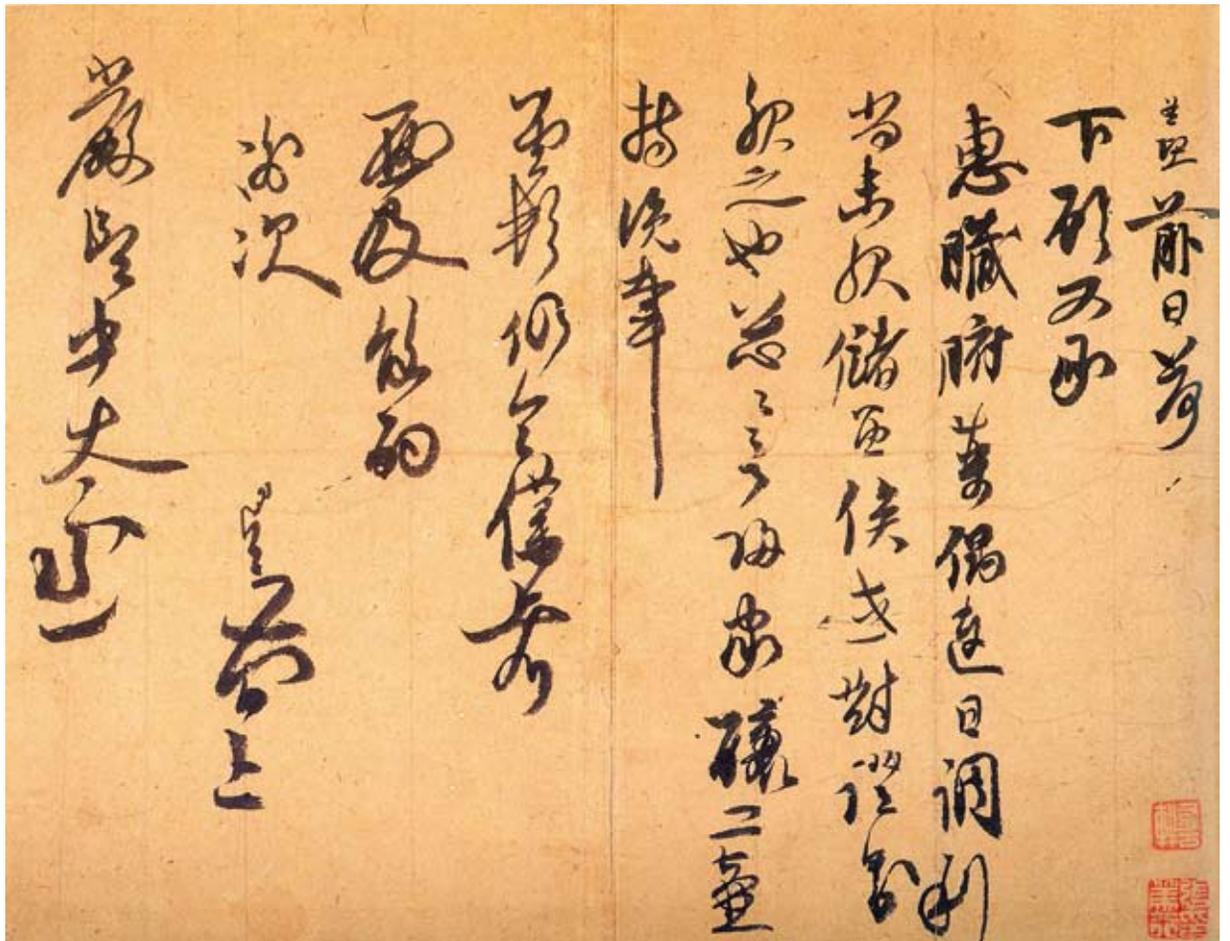


圖23 趙孟堅 致嚴堅中丞尺牘 紙本冊頁 25.5×33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